

中國文化研究 通訊

Newsletter on Chinese Cultural Study

2022年第4期

总第24期

西北大学优秀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基地

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主办

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创新智库

西北大学黄帝文化研究院

◆ 工作简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精品课程”获批陕西省“大思政课”建设试点项目 / 2

李浩教授在“园林研究的多维视角”学术会议上做主题发言 / 3

“清编《全唐文》校订”入选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 / 4

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推出阶段性成果 / 5

顾问

张岂之 王亚杰

郭立宏 吴振磊

主编

李 浩

执行主编

张海青 赵 杭

责任编辑

陈战峰 王早娟

刘晓宇 刘 晓

王晨佳 郭 琳

肖 潇

封面题字

袁行霈

◆ 专家观点

陈翀 日本古文献《江谈抄》所见全唐佚诗句辑考 / 6

葛云波 一组流传海内外五百年的“骂贪官”诗 / 13

松原朗 《海外研究中国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的编译宗旨 / 22

李 浩 山川异域，心理攸同 / 28

◆ 学术平台巡礼

西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 30

◆ 学者风采

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王伟 / 34

杜甫研究专家——胡永杰 / 37

◆ 新书推介

《唐代教育与文学》 / 39

《文心见园：唐宋园林散文研究》 /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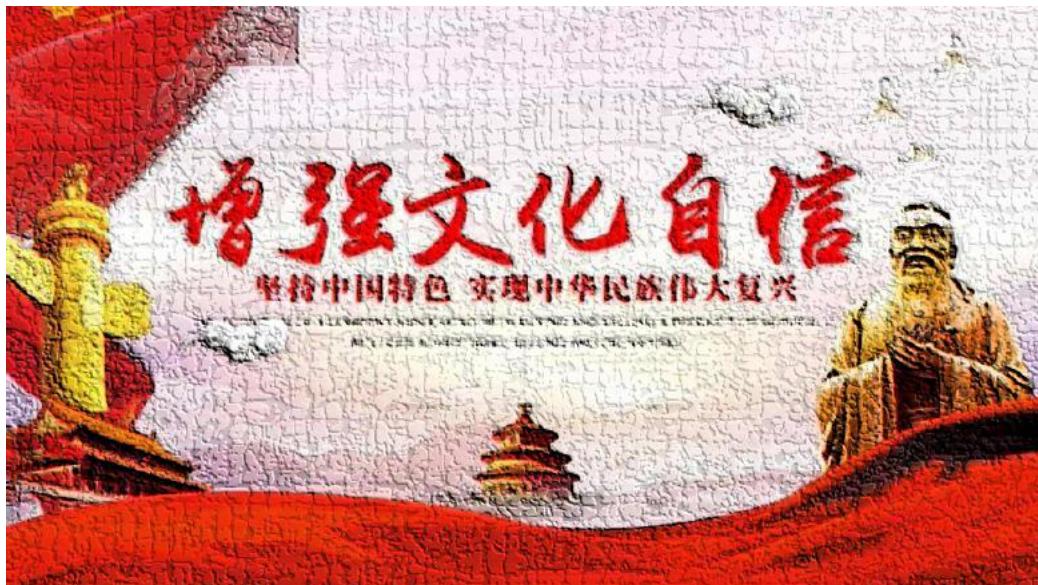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精品课程” 获批陕西省“大思政课”建设试点项目

2022年11月15日,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公布了陕西省“大思政课”建设试点项目名单,中心主任李浩教授主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精品课程”入选陕西省“大思政课”系列精品课程建设项目,为西北大学获批立项的四个“大思政课”项目之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精品课程”将由西北大学中国文研中心与校内外多家文化单位通力合作建设,项目拟建成面向本科生的基础通识课、面向研究生的专题讲座性质课程以及针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和面向社会大众的网络课程,形成覆盖不同阶段学习者的课程系列。课程通过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引领学习者了解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制度等方面的文化精髓,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对中国文化

的特质作整体性观照。在具体内容设计上,课程由“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物质文化”“礼制与科举文化”“家族与民俗”“思想文化”“文学与艺术”“中国文化与世界”几大教学版块组成,分别由相关领域具有良好学术修养和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家负责,以最大限度发挥团队优势。系列课程的宗旨,在于引导学习者认识、浸入传统文化,提高人文素养,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鼓励学生传承中华文脉,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精品课程”的开展,体现了西北大学充分挖掘百廿办学育人资源,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优势的努力与成效,是对西北大学构建“大格局”、培养“大先生”、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以及陕西省“大思政课”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积极响应。



李浩教授在“园林研究的多维视角”学术会议上做主题发言

2022年11月20-21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上海古猗园联合举办的“文学、美术、建筑——园林研究的多维视角”学术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在上海隆重召开。来自文学、美术、建筑等领域的50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经验视角展开精彩对话、碰撞思想火花,搭建起跨学科、多维度的学术讨论平台,进一步推动园林文化研究。中心李浩教授受邀以线上方式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唐代园林的文化记忆”主题发言。李浩教授运用“文化记忆”理论,分别从空间记忆、时间记忆、从历史记忆到文化阐释三个方面解读了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

园林空间记忆可通过对唐代诗文的解读感知。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记录了与辋川别业相关的园林环境讯息和空间方位的记忆。唐代部分园林以诗、文、绘画并存的现象承载园林的空间记忆,王维辋川别业、卢鸿一嵩山草堂、韦嗣立逍遙谷别业、李德裕平泉山庄、裴度绿野堂、白居易履道池台等园林都既有实景又有诗文图绘。“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有些园林则经由历代游观者的书写,积累越来越多的文化记忆,从而成为名胜景观。

从时间记忆的角度来看,唐人园林作品有些以吊古的方式咏叹唐及唐前园林,这是园林在时间发展中逐渐积淀为遗址的现象。有些园林则在不同朝代都产生与之相关的诗、文与绘画,这形成了园林的时间记忆。

唐代园林实景已多堙灭,名园经历了从历史记忆到文化阐释的过程。名园的文化阐释以名胜的文本化为基础,阐释过程中逐渐形成景观符号化现象。后人不仅凭吊名园遗址,也出现阐释与之相关的文本文字现象。对于唐代园林,后代亦有遗址保护及园景再造的举措。

李浩教授长期深入研究唐代园林文学,在发言中广泛征引唐代园林文献,形成鲜明的论点和精辟的见解。李浩教授的精彩发言赢得了现场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



“清编《全唐文》校订” 入选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

近日，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项目（第一批）名单揭晓，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陈尚君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浩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郝润华教授共同承担的“清编《全唐文》校订”项目成功入选，堪称唐代文学与文献研究领域的一大盛事。

《全唐文》成书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共1000卷，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且最受学界重视的唐五代文献总集之一。从成书伊始至今，不断有学者对《全唐文》进行考订整理，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新出版的大型丛书和唐代文史研究著作、新出土的唐代碑志等数量可观，为

清编《全唐文》的校勘、系年、订讹等提供了优良的文献基础。有鉴于此，陈尚君、李浩、郝润华教授通力合作，在深度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清编《全唐文》进行标点校勘、系年考证、小传订正和篇目溯源等整理工作。全书预计3000万字，拟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届时将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当今最为精确的《全唐文》版本，满足新一代研究者、读者的高层次需求。

作为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清编《全唐文》校订”当会引起学界对唐文的重视，这对“《全唐文》学”的建立以及推进唐代文史乃至唐代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推出阶段性成果

2022年12月5日,南开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期刊《文学与文化》第4期(总第52期),以“重大项目成果”为专栏,由中心主任李浩教授担任主持人,推介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该专栏共发表4位专家学者的文章,其中包括王书艳《初盛唐园林的写意艺术及其诗话渊

源》,李小奇《辋川别业的文化建构和文化影响》,张薇《图像内外:清代王云〈休园图〉的家族形塑倾向》,樊文军《邵雍及其洛阳园林书写》等。

此次专栏推介也是继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报》以专版形式推介“中国古代园林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重大课题项目成果之后的又一次专门推介,足以看出重大课题项目系列成果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认可。



日本古文献《江谈抄》所见全唐佚诗句辑考

陈 猷

摘要:本文在梳理日本古典籍《江谈抄》传本系统的基础上,指出这些由大儒大江匡房讲授、藤原实兼记录的语录,反映的是平安晚期王朝学术最前线的一道论学风景,是一部了解隋唐汉籍及文学思想东传之珍贵的域外史料。其中所引用的汉文诗句,对于辑佚校勘全唐诗文大有裨益。基于此,笔者将从书中辑出的全唐佚诗整理成稿,逐句加以考证,以备今后增补全唐诗文时参考。

关键词:大江匡房;江谈抄;全唐佚诗;白居易;谢偃;章孝标

一、《江谈抄》之传本及其文献价值

《江谈抄》是日本学者研究平安政事文艺时最为重视的一部古典籍,书名中的“江”,指的是平安晚期大儒大江匡房(1041—1111),“谈”则为谈学论道之意。后人取“江谈”二字偏旁,又将其雅称为《水言抄》。据学者考证,此书本是大江匡房晚年的授课语录,由藏人藤原实兼(1085—1112)整理而成。不过,书中还包括了几则实兼去世后的大江语录,是知现存各本可能还陆续经过了后人的一些递补。

大江匡房是平安时期最为著名的文人,可称得上是平安后期政治学术的灵魂人物。其父亲是曾任大学头的大江成衡(生卒年不明),曾祖父则是曾主持过《集注文选》《集注史记》等大型汉籍

笺注工作的大江匡衡(952—1012)^①。据说匡房自幼聪慧过人,不但精通汉诗文,而且还擅长吟咏和歌。天喜四年(1056),匡房便以十六岁之幼破格通过省试,选补为文章得业生,十八岁时又一鸣惊人,对策及第,名满京华。及第后不久,匡房被任命为治部少丞,旋又转式部少丞。治历三年(1067),提拔为担任太子尊仁亲王教育职务的东宫学士。翌年,尊仁亲王继位成为后三条天皇,匡房亦以帝师之名份升任藏人,从此走上了官途坦道。匡房曾一身兼任左卫门权佐、右少弁等显要职位,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三事兼带”的殊荣,可谓权倾朝野^②。

除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匡房同时又是大学寮中枢东曹江家的嫡系掌门人。匡房以其淹古通

^①有关大江匡衡的汉籍注释活动,可参见拙稿《〈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10年,页501—514。

^②有关大江匡房事迹,可参见以下两种专著:(1)川口久雄《大江匡房》,吉川弘文馆,1968年。(2)矶水绘《大江匡房:硕学の文人官僚》,勉誠出版,2010年。

今的过人学识，曾先后担任后三条、白河、堀河三代天皇太子时期的东宫学士。经匡房之手扩建的江家文库，规模甚至超过了大学寮的公设文库，一度被平安公卿贵族视为维持王朝学术命脉的中枢机构^①。更值得一提的是，应德三年（1086），匡房打破法令规制，首次跨越了儒家与贵族之间的门户天堑，破格提拔为从三位，名列公卿^②。因其还曾两度出任大宰权帅，又被时人尊称为“江帅”。匡房现存著作有《江帅集》《洛阳田乐记》《本朝神仙录》《江都督纳言愿文集》等。

而《江谈抄》的记录者藤原实兼（1085—1112），亦非一位等闲之辈。实兼的祖父是曾任大学头的文章博士藤原实范（生卒年不明），其子则是以著有《通宪入道藏目录》而闻名的藤原通宪（1106—1160）。实兼出身于以儒学著名的藤原南家嫡系，年幼时即被提拔为鸟羽天皇近侍。鸟羽天皇即位之后，立即被升任为藏人，有望继承儒学正统。但不幸的是，实兼猝死于天永三年（1112）四月，年仅二十八岁。藤原宗忠（1087—1138）云其“颇有才智，一见一闻之事不忘却，仍才艺超年齿。”^③是知其亦是学问过人。总而言之，可以说《江谈抄》所反映的乃是平安晚期王朝学术最前线的一道论学风景，是一部我们了解隋唐

文学及汉籍东传的绝佳史料。

《江谈抄》内容极为繁博，全书共分六部，卷一收《公事》《摄关家事》《佛神事》三部，卷二、卷三、卷四同为《杂事》部，卷五为《诗事》部，卷六为《长句事》部。特别是卷二以后的章节，主要集中在谈论本朝名贤及六朝隋唐诗家的汉诗作法、诗文掌故、风流韵事，与两宋诗话体裁极为类似，直可视其为日本诗话的开山之作^④。书中所谈及的一些诗文佳句，还常被见引于《倭汉朗咏集》《千载佳句》等典籍之中，由此又可以证明，这些诗文确曾是流行于平安诗坛的模范章句。另外，书中还记录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唐人秘事，如方干兔子唇、卢照邻残障、王勃八岁作诗等，饶有趣味^⑤。而卷三《杂事》所记的各种唐乐器名以及相关逸事，则更是研究唐代音乐不多的第一手史料，尤为珍贵。

《江谈抄》最大的篇幅还是用来谈论日本本朝文人诗文与隋唐诗文于诗语用典上的继承关系，因此言谈之中引用了大量彼时流行的唐诗佳句，如下文所要谈到的吕荣、张方古等人，都是现在已佚名的唐代诗人。这些人能够在异国文学讲坛上拥有一席之地，成为平安的诗学范例，可见其时也应是名靡中原的诗家高手。另外，从匡房

^①有关江家文库的考证，可参见拙稿《王朝公权的威严象征：略谈日本汉籍的一个重要特性》，《中文学术前沿》第一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53—62。

^②按，平安律令曾有规定，大学寮出身的儒家，最高位不得超过正四位，从三位以上的官职称“贵”，只能由平安朝核心贵族担任。

^③参见藤原宗忠日记《中右记》第四册天永三年四月三日条，《史料大成》所收本，内外书籍株式会社，1934年，页148。

^④学界一般认为日本诗话开山之祖为虎关师鍊（1278—1346）的《济北詩話》，如果将《江谈抄》中所录的《诗事》、《长句事》之两部分视作“诗话”，则可将诗话体出现于日本推前将近二百余年。

^⑤按，有关方干、卢照邻等人的逸事，后亦见录于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由此亦可证明《江谈抄》所记唐人逸事并非平安文人所捏造。

语录我们还可以看出,平安汉诗文学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一部分精英开始热衷比较和汉诗歌作法的优劣、意境之高低,关心唐诗名篇的笺注,甚至对平安文人的至尊偶像白居易的诗文,也逐渐有了一些评头论足。如卷四《杂事·兰省花时锦帐下》“兰省花时锦帐下,庐山雨夜草庵中。白。古人传云,此句文集第一句云云。故源右府仰云,不避三连之句也,难为规模云云”,认为过去被先贤们奉为《白氏文集》第一佳句的“兰省花时锦帐下,庐山雨夜草庵中”,乃是一联犯了律诗“三连”大忌的病句,不应该用来作为学诗典范。又如卷五《诗事·王勃元稹集事》云:“王勃元稹集事。又被命云,注王勃集,注杜工部集所寻取也。元稹集,度度虽逃唐人,不求得云云”。过去一般根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无杜甫诗集之明确记载,推测杜诗传入日本乃五山时期之事。然据此条记载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匡房时代之前的平安不但已经传入了杜甫诗集,并且收藏了《注王勃集》《注杜工部集》等一批别集注本^①。以上这些记载虽只是些片言碎语,却均是我们了解唐诗传播之最为珍贵的史料。

今存《江谈抄》之传本,大致可分为类聚本系

统与古本系统。上文所提到的六分部本,属于类聚本系统。此本乃是日本中世文人的重编本,也是现在最为通行的本子。其底本为群书类从所收版本,另参校了宫内厅书陵部藏柳原纪光本。此本的校注可参照江谈抄研究会编的《类聚本江谈抄注解》^②。古本系统,则是指没有经过后人整理的古抄系统残卷本,主要有醍醐寺藏《水言抄》、神田喜一郎藏《江谈抄》(高山寺旧藏本)、前田家尊经阁藏《江谈抄》(金泽文库旧藏本),相关研究则有同为江谈抄研究会所编著的《古本系江谈抄注解》^③。此外,对于《江谈抄》的综合研究,先后还有川口久雄、奈良正一两氏所著的《江谈证注》^④及甲田利雄著三卷本《校本江谈抄とその研究》^⑤。这两个注本都是后出转精,考证十分缜密,是今人利用《江谈抄》时缺一不可的必备书。

由于《江谈抄》成立于平安晚期,此时两宋刻本还没有大量东传^⑥,因此,其文中引用的六朝隋唐诗文大多保持了宋前旧貌,具有很高的文本价值。对于此,笔者在他文中已有谈及,此处就不再赘言^⑦。以下着重于整理此书中唐佚诗句,附以考证,以供海内外学者参考。

二、《江谈抄》所收全唐佚诗句汇考

^①有关杜甫诗文在日本的受容概况,可参见静永健师《日本における杜甫研究主要專著および研究者解題》,《中唐文学会报》第11号,2004年,好文出版。

^②武藏野书院,1983年。主要编著者如下:后藤昭雄、田口和夫、仁平道明、根津夫。又,本文所引《江谈抄》本文均以此本为底本,参校古抄系统本,如无重要文字异同,不再一一注出。

^③武藏野书院,1978年。主要编著者如下:植松茂、后藤昭雄、田口和夫、根津夫。

^④勉诚社,1984年。此本除了笺注之外,还附录现代日语译文及《江谈抄》佚文。

^⑤续群书类从完成会,1987年。此书上、中两卷为《江谈抄》的本文研究,下卷收专题考论。

^⑥参见前引拙稿《王朝公权的威严象征:略谈日本汉籍的一个重要特性》及《两宋时期刻本东传日本考—兼论金泽文库之创建经纬》,《西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页35—43。

^⑦参见拙稿《新校〈白居易传〉及〈白氏文集〉佚文汇考——以日本中世文献为中心》,《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页9—19。

(1)吕荣《望花山》:花岳阴深秀色浓,削成三朵碧芙蓉。

句出卷四《杂事·四五朵山妆雨色》,原文如下:“四五朵山妆雨色,两三行雁点云声。杜荀鹤淮阳道中咏,古来难意也,但大略见古集以莲喻山也。吕荣《望花山》诗云:花岳阴深秀色浓,削成三朵碧芙蓉。张方古《女几山》诗云:空唱香几在山上,碧玉莲花数朵高。云云。”按:吕荣《望花山》,或可读作吕荣望《花山》,考诸本原训均读为《望花山》,今从日人古训。吕荣,《全唐诗》未收。考今存唐诗人名之中,亦无见有称吕荣者。大江匡房语称此诗出自“古集”,查《江谈抄》卷五《诗事·古集体或有对不对事》条对此“古集”有所言及,其文云:“古集体或有对,或有不对,如何?被命云:是方干者,缺唇者也;卢照邻者,恶疾人也;李白者,谪仙也。或人间云:以李白号谪仙人之由见《文集》,是谓文章之体譬谪仙欤?又实以金骨之类欤?被答云:实谪仙也。”由知“古集”乃指时人所编唐人诗文选集。亦由此可确认吕荣乃是佚名唐诗人,当补入《全唐诗》。又按,本条正文所引杜荀鹤诗,《唐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二题作《隽阳语道中》,《全唐诗》卷六百九十二题作《隽阳道中》。考自古并无隽阳地名,是知《唐风集》及《全唐诗》所录诗题均误,当从《江谈抄》改作《淮阳道中咏》。又按,“两三行雁点云声”之“点”,《唐风集》作“帖”,《全唐诗》作“贴”,三者相校,似当从《江谈抄》作“点”;“声”字,诸本同,唯宫内厅书陵部藏柳原纪光本旁用小字注“秋”,与《唐风集》与《全唐诗》同,今存疑。不过,

《江谈抄》句用“声”对“色”,以南渡之雁声来渲染秋意,意境似更胜一筹。

(2)张方古《女几山》:空留香几在山中,碧玉莲花树朵高。

出处见上条,原文作“空唱香几在山中,碧玉莲花树朵高”。按:张方古,与吕荣同为佚名之唐诗人。此句又见引于《倭汉朗咏集私注》,题作《望女几山》,“空唱”作“空留”^①。“空唱”语义不通,或是传抄中所出现的讹误,今据《倭汉朗咏集私注》改。

(3)杨衡《上春词》:圣皇自在长生殿,不向蓬莱王母家。

句出卷四《杂事·圣皇自在长生殿》,原文如下:“圣皇自在长生殿,不向蓬莱王母家。杨衡上春词。蓬莱、王母家二所欤。”按,杨衡,两唐书无传,白居易《代书》云:“庐山自陶、谢泊十八贤已还,儒风绵绵,相续不绝。贞元初,有符载、杨衡辈隐焉,亦出为文人。”^②由知其曾隐于庐山,为贞元时期人。小传见《唐才子传》卷四,诗收《全唐诗》卷四百六十五。另外,此句又见引于《千载佳句》下《宫省部·禁中》、《倭汉朗咏集》卷下《杂·帝王附法皇》,是知此句深为平安文人喜爱,或与日人憧憬明皇杨妃事有关。又按,此句陈尚君先生已据通行本《倭汉朗咏集》补入《全唐诗续拾》,然题作《上阳春辞》。考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镰仓时期旧钞本《千载佳句》作《上春词》,正与《江谈抄》同。再查宫内厅藏传藤原行成笔《御物粘叶本倭汉朗咏集》条下并未曾注诗题,可知通行本诗题乃后人所加。又考“上春”一词,典出《周礼注疏》

^①参见山内潤三等编《和漢朗詠私注》所收古写本二种,新典社,1982年。

^②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第一册,中华书局,2011年,页280。

卷二十《春官宗伯·天府》，原文如下：“上春，釀宝镇及宝器。郑玄注：上春，孟春也。”^①是知此诗题当从《江谈抄》改作《上春词》。

(4)白居易《八月十五夜》：踏沙披练立清秋，月上长安百尺楼。

句出卷四《杂事·踏沙披练立清秋》，原文如下：“踏沙披练立清秋，月上长安百尺楼。《文集》八月十五夜诗。此诗，朝纲卒去之后。送数年，于相公二条京极梅园旧亭，八月十五夜，时好士有口辈，玩月到彼梅园旧亭。有老比丘尼一人，出来问曰，谁令游给哉？故宰相殿之遗，唯尼一人也。彼家奴共夭死，尼亦不知明旦云云。好事人人弥以感叹拭泣。然间尼曰，抑月八上长安ノ百尺楼诗、不似往日相公之咏。月ニトコソ被咏シカ。今夜也。月ニヨリテ上百尺楼也。月ハナニシニ楼ニハ可登ゾト云ニ、人人皆信伏、问尼、答云、故宰相殿ノ物张ナリ。依人人各给缠头，终夜语了。相公之风咏珍重云云。”按，此诗下明注出《文集》，是知此句引自《白氏文集》。然今存《白氏文集》诸本未见，或是从卷十二佚出诗之一^②，《全唐诗》亦未收，两当补入。

(5)谢偃《杂言诗》：佳辰令月欢无极，万岁千秋乐未央。

句出卷四《杂事·佳辰令月欢无极》，原文如下：“佳辰令月欢无极，万岁千秋乐未央。谢偃杂言诗。此诗，蹈（按，当作“踏”）歌诗也。古塔瓦铭，

有万岁千秋乐未央字。今案，件文，见唐宝神州三宝感通录上。件录云，仁寿二年正月，复分布舍利塔五十三州，至四月八日，同年时下。其州如左云云。其中梨州塔地下瓦文，千秋乐云云。件录，唐麟德元年终南山释氏所撰也。”按，谢偃，隋末唐初人，以诗赋闻名，曾与宗楚客一起参与过编撰《括地志》。《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收其本传。《旧唐书·经籍志》录“谢偃集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则记为“七卷”。此外，《新唐书·艺文志》又别录其有“英公故事四卷”。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七百七十七《总录部·名望二》云：“谢偃善为赋，李百药工为五言诗，时人称为李诗谢赋。仕至魏王府功曹。”^③《全唐诗》卷三十八仅存其《踏歌词三首》《乐府新歌应教》诗四首。此句不见《全唐诗》，陈尚君先生据《倭汉朗咏集》补入《全唐诗续拾》。又按，大江匡房所提“唐宝神州三宝感通录”，当指唐道宣所撰《集宝神州三宝感通录》，云仁寿二年隋文帝在全国建造舍利塔时，地瓦刻录“万岁千秋乐未央”句。长乐、未央乃汉宫殿名，汉瓦当中多刻有此铭，谢偃此诗亦是沿用古句。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作《登封大酺歌四首》，其一云：“明君封禅日重光，天子垂衣历数长。九州四海常无事，万岁千秋乐未央。”^④末亦全用此句。

(6)章孝标《及第日报破东平诗》：三千仙人谁得听，含元殿角管弦声。

^①《十三经注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776。

^②有关今存《白氏文集》诸本卷十二为残卷的考证，可参见前引拙稿《新校〈白居易传〉及〈白氏文集〉佚文汇考——以日本中世文献为中心》。

^③《宋本册府元龟》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页2820。

^④参见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177。

句出卷四《杂事·三千仙人谁得听》，原文如下：“三千仙人谁得听，含元殿角管弦声。章孝标。此诗意人难得（先达未决）。及第日报破东平诗也。”按，此句《全唐诗》卷五百六章孝标诗中未收，陈尚君先生据通行本《倭汉朗咏集》卷下《杂·禁中》补入《全唐诗续拾》，然通行本“三千”误作“三十”，当改正。又，匡房云此诗意难懂，盖不知“破东平”三字之意。考柳宗元有《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赦表》《柳州贺破东平表》等^①，是知“破东平”乃指唐宪宗时破平卢李师道一事，由可推知此诗作于元和十四年。此年章孝标进士及第，亦正与诗题所咏相符。章孝标，两唐书无传，《新唐书·艺文志》记“章孝标诗一卷”。然《千载佳句》收其诗数仅次于元白与许浑（白居易五百七句，元稹六十五句，许浑三十四句，章孝标三十句），《通宪入道藏目录》记“章孝标集一卷”，由知其诗在平安文人之间流传极广，深为当时权贵喜好。

（7）白居易：放龙放龙在牛角，雷击竟来牛狂死。

句出卷五《诗事·文集无同诗哉事》，原文如下：“《文集》无同诗哉事。又被命云，《文集》无同诗耶。仆答曰，‘苑花如雪随行辇，宫月似眉伴直庐’。此诗在天宝叟长韵诗，又在四韵诗。又云，‘一以老年泪，泣洒故人文’。又哭晦叔‘唯将两眼泪，一洒秋风襟’云云。仆问，许浑集‘一樽酒尽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之句，在二ヶ处。帅被答云，然也。仆问云，《文集》‘放龙放龙在牛角，雷击竟来牛狂死’，其义如何。帅被答云，件事见《旌异记》，不具记。”按，“放龙放龙”，《江谈抄》整理本均误作“放放龙龙”，语义不通，乃误读了底本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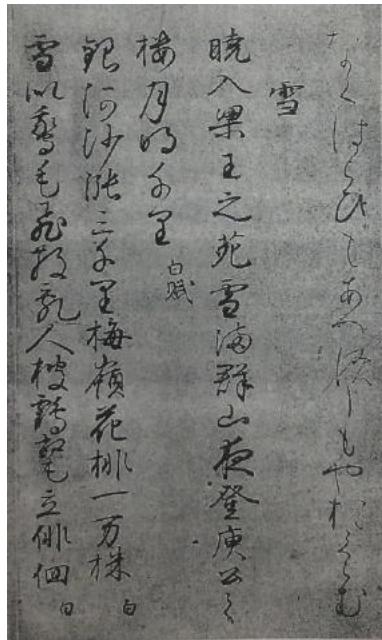
字符号。白居易《偶然二首》之二：“火发城头鱼水里，救火竭池鱼失水。乖龙藏在牛领中，雷击龙来牛枉死。人道蓍神龟骨圣，试卜鱼牛那至此？六十四卦七十钻，毕竟不能知所以。”^②三、四句与此联类似。不过此则语录乃谈《白氏文集》中多有类似诗句，是知此句非出自《偶然》诗。又此联为整齐的七言诗，亦可排除其为实兼对《偶然》诗意概括，当是白集卷十二佚诗之一，亦不见收于《全唐诗》，两当补入。又，大江匡房言此句出典《旌异记》，《隋书·经籍志》记“旌异记十五卷 侯君素撰”，然卷五十八《陆白传》又称陆白“著《旌异记》十五卷行于世”。两唐书《艺文志》则均只叙录侯君素《旌异记》十五卷（旧唐书误作侯君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旌异记十卷侯君素撰”。匡房所指《旌异记》，或是侯君素撰本。

（8）白居易《赋买嵩》：晓入梁王之苑，雪满群山。夜登庾公之楼，月明千里。

句出卷六《长句事·晓入梁王之苑》，原文如下：“晓入梁王之苑，雪满群山。夜登庾公之楼，月明千里。白赋买嵩。检秋赋登字作归字，雪满群山是《文选》文也。”按，诸本对此条均无明考。通行本据京都府立图书馆藏《倭汉朗咏集》改“买嵩”为“贾嵩”，将此文署为贾嵩《白赋》。贾嵩，两唐书无传，《新唐书·艺文志》载“贾嵩赋三卷”，《宋史·艺文志》载“贾嵩陶先生传序三卷”“贾嵩赋集三卷”。《崇文总目》卷十二载“贾嵩赋二卷阙”，是知其文集至北宋就已散佚。《文苑英华》卷五收其《夏日可畏赋》一篇。《唐语林》卷二《李训讲周易》条云其曾任文宗朝水部员外。赵嘏《赠解头贾嵩》：

^①参见《柳宗元集》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79年，页997—980。

^②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三册，中华书局，2006年，页1323。



“贾生名迹忽无伦，十月长安看尽春。顾我先鸣还自笑，空沾一第是何人。”^①是知其曾高中解元。

又，项斯《成名年献座主仆射兼呈同年》诗云：“拂烟披月羽毛新，千里初辞九陌尘。曾失玄珠求罔象，不将双耳负伶伦。贾嵩词赋相如手，杨乘歌篇李白身。除却今年仙侣外，堂堂又见两三春。”^②将贾嵩词赋比作司马相如，因知其亦不失为晚唐诗文名家。文天祥《五色赋记》有文云：“孟春之二十五日，发舟石鼓。越三日过衡山宰赵孟傃，送县志遗逸门一段云，寇豹与谢观，同在唐崔裔孙门下，以文藻知名。豹谓观曰，君白赋有何佳语。对曰，晓入梁王之苑，雪满群山。夜登庾亮之楼，月明千里。”^③言此句乃谢观之作。同样记载

又见《诗话总龟》卷四十四《寇豹》条。今日本学者注《倭汉朗咏集》，又多将此句之作者改为谢观，当是受宋人记事之影响。然谢观乃小说中人物，实非真有其人。其实，此句乃引自白居易佚文《赋买嵩》。考宫内厅藏传藤原行成笔《御物粘叶本倭汉朗咏集》此条下注“白赋”，后引白居易《雪中即事》诗“银河沙涨三千里，梅岭花排一万株”句及《酬令公雪中见赠》诗“雪似鹅毛飞散乱，人被鹤氅立徘徊”句，两文下均注“白”（参见上页图1）。《御物粘叶本倭汉朗咏集》句下小字注“白”均指“白居易”。又参《江谈抄》所记，知此句乃出自白居易《赋买嵩》，因此行成本简注其为“白赋”。又按，“买嵩”一语，典出《晋书·王猛传》，其文云：“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人也，家于魏郡。少贫贱，以鬻畚为业。尝货畚于洛阳，乃有一人贵买其畚，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无远，可随我取直。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父老，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猛进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缘拜也。乃十倍偿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顾视，乃嵩高山也。”^④李白《留别王司马嵩》“呼鹰过上蔡，买畚向嵩岑”句，亦是沿用此典^⑤。今人不解此用典，才有篡改文题之举，当改。

（陈翀，1974年生，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准教授，研究领域为晋唐文学及文献学研究、东亚汉籍交流史。本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后选入《东亚唐诗学研究论集》（第二辑））

^① 谭优学《赵嘏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155。

^② 《文苑英华》卷二六三，中华书局，1966年，页1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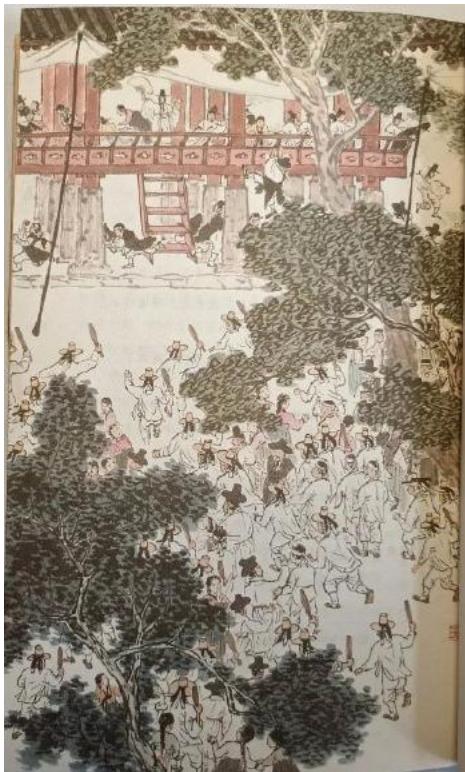
^③ 《文天祥全集》卷九，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页220。

^④ 《晋书》卷一百四《王猛传》，中华书局，1974年，页2929。

^⑤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908。

一组流传海内外五百年的“骂贪官”诗

葛云波



《春香传》骂贪官诗写后的官员奔逃的场景

因为独特的内容,一首诗会被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长期唱诵、引用。那些引用它的人当中,会因地制宜地稍作改作、修饰。原本的诗,便有了许多变身,部分面貌会“走了样”,但骨骼、心地,仍在那里。这样一种变身若干的诗,因为它们都源于最初的一首诗,我姑且叫它们“同根诗”。

今天要谈的一组同根诗被称为“骂贪官”诗。实际上,至今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流传于海内外五百年的一系列诗,而仅仅限于知道嘉庆

皇帝做了一首,而朝鲜经典名著《春香传》也引了其中的四句。2004年,似乎是嘉庆皇帝“骂贪官”诗重新焕发生机的起始年。这一年,阎崇年在央视10套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第十二讲中引到了嘉庆皇帝“骂贪官”诗。本年7月8日,邱捷教授在《南方日报》发表《嘉庆皇帝的骂贪官诗》,认为《春香传》引用嘉庆诗,引起较大反响。黄国营教授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春香传》时接受记者采访,也认为它借用了嘉庆诗(《春香传》借嘉庆诗“骂贪”),光明网2007年1月17日)。2022年5月5日,邱捷教授又在《南方周末》发表《嘉庆皇帝与〈春香传〉中的一首诗》,扩充了2004年一文,仍持原有观点。



《春香传》书影

其实 17 世纪朝鲜就已有与《春香传》“骂贪官”诗相近的诗，所以“信纲”君断定《春香传》抄嘉庆诗一说“并没有注意到该诗在朝鲜的流传已久，显然不能成立”（《春香传》名句“金樽美酒千人血”源流考》《再考》，“史图馆”网站 2018 年 3 月 20 日、4 月 1 日）。朝鲜本国有诗歌资源，《春香传》何必往异域、后代找资源呢？“信纲”君引到赵庆男(1570—1641)的《续杂录》天启二年(1622)二月三日条，认为是朝鲜“最早出现这首诗”：

光海时天将赵都司来京，有诗曰云云。又曰：
“清香旨酒千人血，细切珍羞万姓膏。烛泪落时人
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盖讥光海政乱民困。

都司，是明代中高级军官的简称，都司掌印、都司佥事及管巡捕、军器、漕运、京操、备御等事务的都指挥使司实权武官，坐营都司、中军都司、车营都司等，都可以称都司。一位不知名的赵都司，看到光海君屡兴疑狱、滥杀官民的乱象，不仅自作诗一首，还很贴切地引用到“清香旨酒千人血”诗，一泄愤怒之情，足见这诗的影响着实不小。这条记载，还见于“信纲”君提到的李喜谦《青野漫辑》、李肯翊 (1736—1806)《燃藜室记述》，又见于郑载仑 (1648—1732)《公私见闻录》、晚窝《诗话抄成》、安肯来(1858—1929)《东诗丛话》等。此诗如此高频率被引，足见它在朝鲜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朝鲜后期史家尹愬(1741—1826)的《无名子集》：“昔人有讥监司之诗曰：‘烛泪落时民泪落，
歌声高处怨声高。’”则是有人曾拿此诗来讥刺掌管监察的按察使。成涉(1718—1788)的高祖成以性(?—1654，号溪西)则作为巡视督察，曾经妆扮成乞丐暗访邑守大宴，《溪西年谱》与成涉《笔



《春香传》书影 2

苑散语》都记载：酒席上，官员请这乞丐作诗，用膏、高韵，他“请纸一丈，写诗曰：‘樽中美酒千人血，盘上嘉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众官吏先是转观疑讶，“书吏呼‘暗行’而直入，诸僚一时皆散”，随后处理了一干官吏，成为美谈。他借此诗，怒责了搜刮民脂民膏而奢侈浪费的官吏。可见此诗作为批评的利剑，在朝鲜人士当中，已是运用自如。《春香传》第四章(一本作第二十回)里，李梦龙假扮乞丐，在卞学道寿宴上赋此诗，随后带领随从查办卞学道，无疑照搬了成以性的经历。事极同，诗亦同，要说《春香传》抄袭，无疑抄袭了《溪西年谱》。成涉去世之年(1788)，都早嘉庆七年(1802)十四年，何况他的高祖成以性要早 150 年。

因为这首诗出现在《溪西年谱》中，李家源教授注释《春香传》时，曾以为它的作者是成以性；

后来看到李喜谦《青野漫辑》对赵都司的记载，又曾疑赵都司才是它的作者。这位明末中级武官真的是它的首创者么？还是他只是照录了明朝他人的诗？

二

看来，还得往明朝这边来搜索一番。

天启年间，有本小说《韩湘子全传》，其第十三回写到韩湘子唱道情，启悟韩愈舍弃荣华富贵，唱后附诗八句，其中二句“满斟美酒黎民血，细切肥羊百姓膏”明显属于此同根诗。

再往前，嘉靖年间，有一种乐天大笑生纂辑的笑话集《解愠编》，其卷二有“虐政谣”：“昔荆守贪虐，民怨兴谣曰：‘食禄乘轩着锦袍，岂知民瘼半分毫？满斟美酒千家血，细切肥羊万姓膏。烛泪淋漓冤泪滴，歌声嘹亮怨声高。群羊付与豺狼牧，辜负朝廷用尔曹。’”“信纲”君引到《广笑府》，文字与此相同，然王国良《从〈解愠编〉到〈广笑府〉》（《汉学研究集刊》2008年）经文献考察，发现1930年代，上海中央书店发行《广笑府》一种，实则是对《解愠编》、明冯梦龙《笑府》两书拼装、改头换面而成的一部伪书。故《广笑府》不可据。

《解愠编》作于嘉靖年间，成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就吸收了它的一些内容（乔孝冬《〈金瓶梅〉对〈解愠编〉的引用及“笑”学意蕴探析》）。《解愠编》称该诗为“谣”，也就是说当地人民当成顺口溜般地经常唱诵，而且范围很广；“谣”前着一“兴”字，说明它久储人们心底，一旦有机会就冒了出来。

嘉靖年间，还有一种戏曲剧本《荔镜记》，其第二出《辞亲赴任》写到福建泉州才子陈三之兄，赴任广南道承差，父亲送时赠言，要他不要贪酷百姓：“古人说：‘袞袞诸公着锦袍，不知民瘼半分毫。频斟美酒千人血，细切肥羊百姓膏。’”剧中明确称，这首诗是“古人说”，在当时知道它是“老物件”了，必定有四五十年以上的时间阻隔了。

由此来看，该诗一定出自一种畅行嘉靖年间、影响一时的作品，从而使得大家对它到了耳熟能详、随机取用的地步。它会是哪部作品？创作它的“古人”到底是谁呢？

三

解决此问题的，仍是我们前边提到的李家源教授。他在探索的路途上，也有过判断上的失误：最初误认该诗作者是成以性，后来误认为赵都



《韩国诗话全编校注》

司，大有跌倒了再爬起来的斗志。他撰有《玉溜山庄诗话》(乙酉文化社 1972 年版)，带有总结自己探索经历的意味：先是列了赵都司一则，又录了成以性一则，最后说：

湖南之人，传诵以为《春香传》作：“金樽美酒千人血，玉饭佳肴万姓膏。”而三四与溪西同。然此实本于《五伦全备》，丘濬作也。（《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 10707 页）

这则诗话，高度概括了此诗在朝鲜的历史轨迹，最后淡淡的一笔，如蜻蜓点水，揭露了它的“老祖宗”。真是大手笔。



丘濬像

有了这一画龙点睛的关键线索，接下来便是找《伍伦全备记》来目验、落实。《伍伦全备记》，今有《古本戏曲丛刊》影印世德堂本。这样的通俗读物，供低层民众阅读，版刷均不精，且小字丛集，阅读殊不易。翻至第十七出《问民疾苦》，于开头

的小字即宾白处，读到了这首诗。时伍伦备授东阳郡刺史，上场诗云：

袞袞诸公着锦袍，不知民瘼半分毫。
频斟美酒群黎血，细切肥羊百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滴，欢声高处怨声高；
为官若不知民苦，虚受朝廷爵禄叨。

寻寻觅觅，终于发现了“骂贪官”诗的真正源头，它比所谓的嘉庆七年诗早了三百年。

《伍伦全备记》的作者丘濬(1421—1495)，广东琼山府人，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弘治七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明史》卷一八一本传说他“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由他写出该书和这首诗，也就很自然。

该书是景泰元年(1450)丘濬在南京寓言轩为兴世教、采用南北曲而创作的(吴秀卿《再谈〈伍伦全备记〉——从创作、改编到传播接受》，《文学遗产》2017 年 3 期)。此剧一出，反响剧烈，到嘉靖时更甚。王世贞 (1526 – 1590)、王骥德 (1540—1623) 说它“腐”，但也看到“歌者习之”的盛况。祁彪佳(1603 – 1645)说“一记中尽述伍伦，非酸则腐，乃能华实并茂，自是大老之笔”代表着不少上层人士的评价。名家关注批评，一方面说明它的影响巨大，谁都得关注它；另一方面会进一步激发读者来关注。“华实并茂”的《伍伦全备记》对于文学创作爆发期的嘉靖时期的作家们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学习对象。这也就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荔镜记》《解愠编》《韩湘子全传》等能

关注到其中的“骂贪官”诗，并纷纷借用不止的根本原因了。有了戏曲、小说、笑话集等中下层次文艺的共同参与传播，那位名不见经传的赵都司，能对此诗烂熟于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丘濬《伍伦全备记》并没有得到极高的评价，到后来因为它重在封建伦理道德说教，近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受到批判，各种文学史里均是对它不利的评价，在新世纪之前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即使到今天，它仍少知音。韩国的李家源教授为何能发现它，从而发现其中的“骂贪官”诗的呢？

四

就在嘉靖年间，也就是《伍伦全备记》最为红火的时期，它就已被引进朝鲜，被改编为汉文小说《五伦全传》。今天首尔大学藏奎章阁刊本卷首有嘉靖辛卯（1531）洛西居士李沆序，卷末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柳彦遇、沈守庆跋。朝鲜政府的

一项重要决定，使《伍伦全备记》在朝鲜的影响登峰造极。《光海君日记》卷一五八载十二年（1620）十一月戊子事：

承文院启曰：祖宗朝以来，设文官汉语吏文肄习之规，极严且重，汉语则通贯《老乞大》《朴通事》《五伦全备》，然后始许训官者仅一二人。

《续大典》卷三《礼典》“译科”条也说：“《五伦全备》新增。以上背诵。《直解小学》今废。”因《五伦全备》“其语雅俚并陈，风渝备至，最长于译学”（《五伦全备谚解》序），替代此前的《直解小学》，从而进入教科书的行列，成为司译院的考试必考科目。考试题中，会从该书中摘出一段，列出开头一句、末尾一句，要求默写出中间的文字。这无疑要求考生必须对此书背诵下来不可。朝鲜文人，



《五伦全备记》第一出



《五伦全备记》兄弟赴任

对于该书非常熟悉是必然的了。为了学好汉语会话,肃宗二十二年(1696)编写谚解本,省去曲词,只翻译宾白部分,1721年司译院刊行。“骂贪官”诗就在宾白部分,它更容易被关注到了。因为是教科书,《五伦全备记》被各方编写印行,所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众多版本,影响可想而知。这是朝鲜文人传抄“骂贪官”诗的重要背景。

《五伦全备记》成为朝鲜汉语教科书,持续了二百多年,直到1865年废止。等到进入二十世纪,现代学术兴起,《五伦全备记》已消歇半个多世纪,因此李家源(1917—2000)这一代学人对它并不熟悉,因此他才有早期两次误判的情形。但是,因为它毕竟在朝鲜畅行二百多年,版本众多,相比较于屡经书灾的中国来,韩国学者更容易接触到它,更容易读到这首诗。

五

将先后出现在《五伦全备记》《荔镜记》《解愠编》《韩湘子全传》《清稗类钞》(引嘉庆帝写诗)、《续杂录》(引赵都司写诗)、《春香传》中所录的“骂贪官”这组同根诗,列表呈现,其间的异同会一目了然。这里仅列举第三至第六句中较为重要的异同。

《五伦全备记》第三句“群黎血”,《荔镜记》首次改作“千人血”,《续杂录》《春香传》作“千人血”,《解愠编》《清稗类钞》作“千家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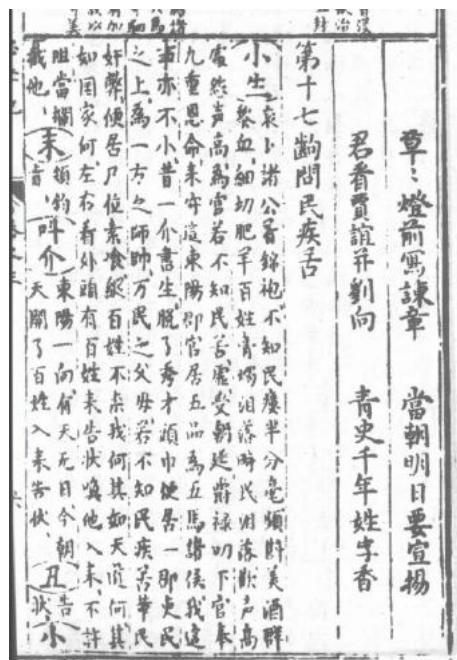
《五伦全备记》第四句“百姓膏”,《荔镜记》同,《解愠编》首次改作“万姓膏”,《续杂录》《春香传》作“万姓膏”。由以上二条,可见《荔镜记》到《解愠编》的演进痕迹。

《五伦全备记》第五句“烛泪落时民泪滴”,《续杂录》《春香传》作“烛泪落时人泪落”,《解愠编》作“烛泪淋漓冤泪滴”。

《五伦全备记》第六句“欢声高处”,《续杂录》《春香传》作“歌声高处”,《解愠编》作“歌声嘹亮”。

在以上提到之处,《春香传》与《续杂录》完全相同,而与其他总有不同,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春香传》抄自《续杂录》所引赵都司所写的版本(由上文可知,记录赵都司的书籍太多了,非常容易被读到),而非抄自《五伦全备记》。《续杂录》主体同于《五伦全备记》,又有吸收《荔镜记》之处(“千人血”),又有吸收《解愠编》之处(“万姓膏”)。在《荔镜记》《解愠编》等稍后,赵都司之前,必有兼采诸家、另有小创的不少版本,已接近赵都司的版本。或许它尚存天壤之间,只是一时未被我们发现而已。

中低层文人在创作中,会借鉴使用前人作品,并适当改动,有的更加生动、细腻,但是有的因为学问不精,所改时有纰漏。比如《五伦全备



最古老的出处:《五伦全备记》第十七出

记》第五句“烛泪落时民泪滴”(仄仄仄平平仄仄)合乎格律,通俗小说《韩湘子全传》改作“常收俸禄千钟粟”(平平仄仄平平仄)就不地道了。《春香传》版本很多,其中安肯来《东诗丛话》所引《春香歌》以及薛舟译本《春香传》均有句“玉盘佳肴万姓膏”(仄平平平仄仄平),第二字与第四字均为平声,便极为出格。这必定是低层文人所为。在涵养深厚的高层文人那里,绝对不会出现此种错误。此处“玉盘”(仄平),成以性写本作“盘上”(平仄),李家源引《春香传》作“玉饭”(仄仄),则均无问题。于此等处,便可以看出编者、译者在诗歌格律上的造诣。

六

再进一步放眼整个东亚文化圈,越南也与此诗有着切不断的联系。

越南阮朝君王都酷爱汉诗写作,圣祖阮福皎(1820—1840年在位)数度下诏求贤良遗书,曾有诏谕曰:“朕于万机之暇,欲览籍典,考制度之沿革,风土之异宜,前已搜寻,遗逸尚多。兹再饬下其家藏奇书,不拘文字鄙俚,言语隐讳,咱得奏览,议行酬奖。”(潘叔直辑《国史遗编》,新亚研究所东南亚史料专刊之一,香港1963年版,112页)阮朝的汉诗文创作出现了数十年的兴盛。阮圣祖本人创作丰富,越南汉喃研究院现存抄本《诏表并御制诗》(A.1881)《诗集合选》(A.2415),其中有《题勤政殿诗》写道:

中外臣僚开锦袍,谁知天下已嗷嗷。
数杯美酒群生血,半盏和羹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
君门勿谓遥千里,孤望皇恩是汝曹。

严明教授《越南汉诗论》注意到这首诗,把它和朝鲜《春香传》所引相联系,并说“并非是有意抄袭,而是在不经意间而相近相似”。由我们上文的讲述,知道这组同根诗,是相互之间有意的引用、改造的结果,而且《春香传》只是中间的一个环节,阮作也不例外。就此组同根诗中的近似部分来讲,阮圣祖此诗,“群生血”同于《五伦全备记》“群黎血”;“百姓膏”与《五伦全备记》《荔镜记》《清稗类钞》等同;“天泪”二句同于《清稗类钞》,与《五伦全备记》《解愠编》稍有不同;末句近于《解愠编》《清稗类钞》。它的第五六句“天泪”“哭声”,不同于《五伦全备记》《春香传》中的“烛泪”“怨声”,所以不是直接受到后二者的影响。就总体而言,相同部分倒是最接近于《清稗类钞》所录的嘉庆帝诗(早阮诗二十年左右)。

严明教授讲此诗说明“东亚各国汉诗之间的密切交流影响关系,以及因奉行儒学而带来的伦理价值观的高度一致”(《传播、影响、交流、互动:“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古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这倒是切中肯綮。

七

徐珂(1869—1928)《清稗类钞·帝德类》记载:“仁宗责臣工诗嘉庆川楚之乱,仁宗忧甚,作诗以责臣工曰:

内外诸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居漫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尔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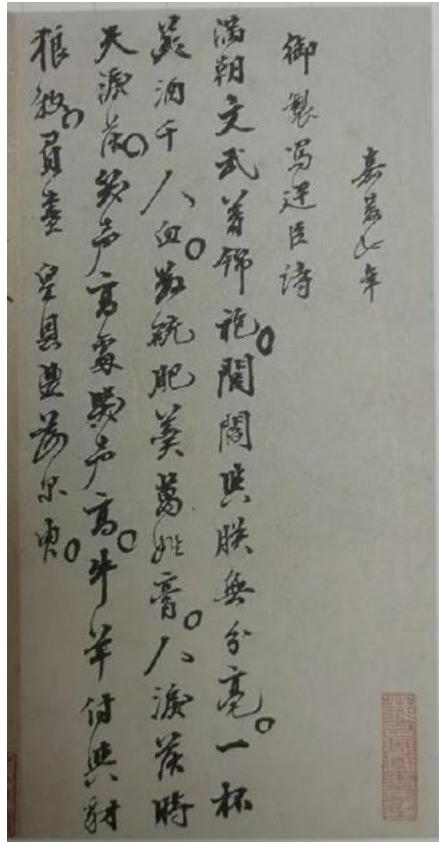
川楚之乱,指的是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元年(1796)到嘉庆九年(1804),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

大的一次国内战争。此诗不管是嘉庆帝作，还是时人伪托他来作的，都是恰合身份与事件原委，情义俱在，虽是改作，可读性和社会价值甚高。

不料，本文开头提到的邱捷教授，看到了与徐珂所载文字不同的嘉庆帝诗，那份邓又同藏梁同书恭录嘉庆七年御制骂廷臣诗的书影，附于邱文。其诗云：

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朕无分毫；
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
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
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

这份书法作品，粗看感觉不错，仔细观摩、体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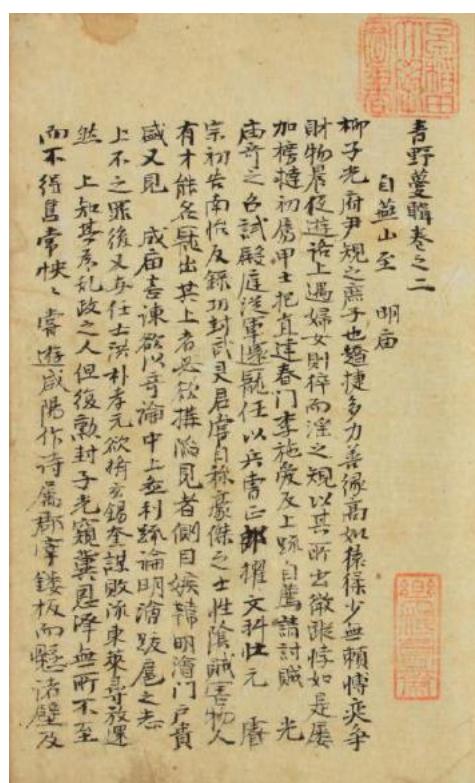


邓又同藏伪梁同书录嘉庆诗

番，则觉其中大有问题。

梁同书(1723—1815)，钱塘人，大学士梁诗正之子。乾隆十二年中举人，十七年特赐进士，官侍讲。自幼习书，工楷、行书，其书大字结体紧严，有《频罗庵遗集》《频罗庵论书》等。观其祝贺师友作品，楷体工整静雅，题对方皆抬头顶格，知书仪如此。但见邱文所附抄件，恭录皇帝诗却用行书，“御制”二字虽则抬头却未顶格，写错文字却不重录，岂是侍讲所宜？

行书上下字之间连笔，需自然流畅，然此抄件用墨不匀，多处连得牵强做作。其中“為”字，笔顺、笔势甚为怪异。试观梁同书所写“為”均同于他人，无此怪形。又抄件中“閭”“落”“與”笔画均含混轻浮。古代书法、书籍，常有一些俗体字，有同于今所谓简体字者，多为行书所致，久写入楷，



《青野漫錄》

如门、则、谓、举、金、请之类，不足怪。然此抄件中有“声”，不作“聲”，最为荒诞。古来高层士人皆无写作“声”的，试读俗字多有的李喜谦《青野漫辑》稿本，也是写作“聲”。

《清稗类钞》引嘉庆诗，首联作“内外诸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说大臣们无人分我的辛劳，语意显豁，主谓宾兼备。而此抄件诗首联作“满朝文武着锦袍，间阎与朕无分毫”，间阎，指乡里、平民或民间。可以解释为：大臣们穿着锦袍，老百姓和我都没有得到分毫的锦袍。除了这种解释，“无分毫”就没有了内容。皇帝竟然没有分毫的锦袍？

《解愠编》引末句作“负尽皇恩是尔曹”。“是”字仄声，甚妥当。而此抄件初抄“是”字，又圈掉（书法中对想删去的字，一般于字侧着两三点），改作潦草的“为”。为，若读作去声，则是为了的意思，但于此句意思不通；若读作平声，是的意思，则意思同于《解愠编》引，但是末三字成了平平平，犯了格律诗的大忌。试想想，梁同书博闻强记，写其他更长的作品时犹能只字不误，反倒抄录皇帝诗时却写错了字？他身为侍讲，连个七律平仄都搞不定，还会往错误处去改？

嘉庆帝能写出如此“烂诗”么？他的父皇乾隆的下笔如有神且不必说，嘉庆帝在作诗上亦非等闲之辈。《嘉庆实录》卷一百七载嘉庆八年正月壬

午圣谕内阁，谦称自己在登基之前，“偶事摛毫”，但见父皇于大事每有吟咏，自己便于嘉庆四年后“夙夜孜孜”于诗作，以国家大事为念，而“素不喜风云月露之词”。父皇每十二年为一集，自己“意欲以八年为一集”，“交庆桂等将元年至八年御制诗编为初集”。是为《清仁宗御制诗初集》武英殿刊本（今有故宫博物院编《清仁宗御制诗》“故宫珍本丛刊”影印）。其所作非李杜欧苏之制，但皆有理致，均合诗律，一则有其皇家家学，二则有翰林大臣润色，岂能有荒唐刺谬之劣什子面世？

综合以上所疑，书法不精，不通语法，不通诗律，灭裂如此，此抄件必是伪作、赝品。其中有简体，可知很可能是1980年代后所伪造，为邓又同先生所收藏。梁同书平生善于鉴别古人手迹，搭眼能判其真伪，却不料遭后人伪托有如此。

从丘濬景泰元年(1450)初作“骂贪官”诗，到风行朝鲜三百年，到远传越南被改写，到民国吴佩孚(1874—1939)改编，再到二十世纪的伪作，这组同根诗穿过了五百年的岁月光景，曾有多少人耳濡目染过它。在倾听、讽诵它时，人们共同倾诉满腔的愤怒，共同希冀公平正义的社会。它，称不上优秀的诗作，却已不朽。

（葛云波，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古典部主任。本文原刊于《博览群书》2022年第7期，图文引自“书目文献”微信平台）

《海外研究中国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的编译宗旨

松原朗(张渭涛 /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在组织翻译的《海外研究中国书系·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是我与李浩教授在中国共同主编的该系列第二辑丛书，将于2024年夏季全套付梓刊行。

本套丛书包含以下日本唐代文史研究的大家名著：

- ①吉川幸次郎《杜甫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暂定题、松原朗最新选编);
- ②宫崎市定《唐宋变革史论》(暂定题、砾波护最新选编);
- ③砾波护《隋唐政治史论考》(暂定题、砾波护最新选编);
- ④古贺登《两税法成立史研究》(日本雄山阁出版);
- ⑤池田温《唐史论考》(日本汲古书院出版);
- ⑥松浦友久《陶渊明及白居易等唐代文学研究》(暂定题、日本研文出版);
- ⑦黑川洋一《杜甫研究》(日本创文社出版);
- ⑧川合康三《唐代文学从考》(暂定题、川合康三最新选编)。

以上这套日本唐代文史大家名著，承继于该系列第一辑丛书、即2019年我与李浩教授主编并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此套则是在该基础上继续推出的第二辑，即选编了八册日本现代唐代文史研究大

家的代表性名著。而第一辑丛书的选编对象则皆限定于目前正在活跃于日本唐代文史研究界的专家代表作，其内容构成为文学四册与史学四册，具体作者及书目如下：

- ①妹尾达彦《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
- ②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
- ③丸桥充拓《唐代军事财政与礼制》;
- ④石见清裕《唐代的民族、外交与墓志》;
- ⑤古川末喜《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业与生活之歌》;
- ⑥埋田重夫《白居易研究——闲适的诗想》;
- ⑦松原朗《晚唐诗之摇篮——张籍·姚合·贾岛论》;
- ⑧冈田充博《唐代小说〈板桥三娘子〉考》。

关于第一辑“日本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的选编经纬及主旨，既已在李浩教授的“总序一”及我的“总序二”中分别给予了详述，择其要者有二：第一，本丛书旨在介绍中国学人或一般读者目所不及的日语世界目前唐代文史的优秀成果；第二，与中国一衣带水之东邻日本，自隋唐开始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着敬爱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而本丛书即旨在以具体研究成果而非从一般观念论上来向中国读者展示该传统至今仍在日本学界薪火相承的事实。

而至于本辑“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丛书的

选编宗旨,首先声明的是,我下文所要陈述的内容并非仅仅出自于一个日本人的立场,而是建立在下面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即在包含日本与朝鲜半岛、越南在内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中,日本其实却是其中的一个“劣等生”而已。所谓“劣等生”,意即日本在此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却并未能如其中国老师所期许的那般不负厚望而学有所成。就此而言的一个颇具象征性的历史事实即在于,自公元600年第一次派遣遣隋使之后,日本对于中国其实一貫都在采取一种如何能够规避成其朝贡国的暧昧外交关系;显而易见,如此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日本不仅从未接受过中国之正朔、而且时至今日也还依旧能够保有自大化而来的独自年号。

此外,科举也是另一个饶有兴味的论点。中国自隋至晚清所盛行的这种依据儒教经典而奉行的科举取士制度,即使在朝鲜半岛与越南也都一直持续进行到了近代。而在日本,却仅仅在迈进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因举国导入律令制度而曾一度试行过类似科举缩小版的“式部省试”,并且少顷即废。而平安初期日本废止“省试”的直接理由则在于,对于当时尚处于浓厚古代氏族制度氛围之中的日本而言,推行这种评价个人才能的科举制度还为时尚早。然而即使到了文明得以发展的平安时代后期,日本也终究未能孕育出可以导入科举制度的时机来。镰仓时代(1192~1333)以降,日本又进入了一个建立在血缘纽带基础之上 的地方豪族(武士)割据时期,而自此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社会一直都处于武士阶层的支配之下。其中江户时代(1603~1867)的武士阶层,虽然实质上作为担任政务的文官而逐渐在向教养式官僚不断演变,然而他们自始至终却从未丧失过其

隶属于各藩(诸侯国)的地方属性;而就武士支配的事实而言,首要的一点即在于从属于地方诸侯,这一关键点却是与重视个人才能并将精英聚拢于中央的科举制度背道而驰的。日本历史上未曾实施过真正的科举制度,这个事实对于理解日本“政治权力的分散性”这一历史大脉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而正因没有实行过科举取士制度,日本中央政府也曾经面临过国家文教政策难以掌控的局面。江户幕府(中央政府)的文教政策虽然是建立在朱子学基础之上的,然而还尚未到18世纪的江户,日本便出现了以标榜反朱子学的伊藤仁斋(1627~1705)、荻生徂徕(1668~1728)为代表的百家争鸣的事态;而突入争鸣并勃兴而起的还有以完全否定汉学的本居宣长(1730~1801)为代表的国学派、及以前野良泽(1723~1803)为代表的兰学(西学)派。针对这种群学进发以反朱子学的态势,江户幕府也祭出了“异学之禁”的政策(1790),冀此以促进朱子学的回归,然实则收效甚微。如果说日本的汉学还尚有其独立性的话,那么在论及其各个学说及其文风特征之前,还是首先应该关注一下日本滋养这些汉学所特有的那种“放任”的人文风土。

若说科举之外还应关注的因素,则日本所特有的“训读语体”也非常重要。最近听闻在日韩裔学者金文京氏的《汉文与东亚世界》(『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岩波新書2010)一书新近译为中文出版,并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按金氏之言,所谓“训读”是将汉文语序转变为本国语序来读解汉文的一种方法(例如将中文的主谓宾语序转变为日文的主宾谓语序),且这种汉文训读的现象却不止仅限于日本、而是广泛流行于朝鲜

半岛与蒙古等中国周边的广大地域。不过，金氏的这个指摘其本身却存在着一个非常重大的漏洞，因为实际上可能只有日本才真正促使“训读”超越了汉文读解上的一时权宜之计而使其转变成为一种成熟的“日语的正规语体”。正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即由日语训读为「朋有り遠方自り來たる、亦た楽しからずや」一样，日语的训读尽可能地保留了汉文中原有的汉字，而仅仅变换了其中极少一部分虚词等汉字，如仅将“不”“乎”换做日语平假名的「ず」「や」，而且毋宁说在日本经由这种方式训读的日文就可称得上是“正规的日语”。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在其发布“终战诏勅”的开头这样说到：「朕、深く世界の大勢と帝國の現状とに鑑み、非常の措置をもって時局を收拾せんと欲し、ここに忠良なるなんじ臣民に告ぐ」，这段日语听起来颇感古格高雅、甚至堪称完美，不过昭和天皇在此所言却的确只是一种真正正规意义上的“日语训读语体”而已；当然，既然日语训读源于“汉文训读”，那么这段诏勅其实能够令人惊异地直接切换为汉语文言文的，即“朕深鑑世界大勢与帝国現状、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時局、爰告汝忠良臣民”。如此形成的“训读语体”就与“和文语体”（即《源氏物语》语体）共同构成了日语语体的两极，再加上将二者折衷之后形成的“和汉混合语体”（即《平家物语》语体），最终构筑起了日语传统书面语体的三足鼎立之势，而现代日语语体即是这种“和汉混合语体”的现代发展形态。总之，若简而言之，历史上日本人则是以“训读”的方式将汉字与汉文彻底融汇消化在了自己的日语语体之中的。与此相对，李氏朝鲜时期（1392～1897）的朝鲜半岛则业已废止了当时尚以萌芽方式存在着的“汉文训读”，转而切换为朝鲜汉字读

音的“直读法”，也因此就使得朝鲜半岛的“汉文训读”无法继续发展成为朝鲜本国成熟的正规书面语体。朝鲜半岛所选择的这种“直读法”，与日本那种语序上下颠倒的训读相比，即便使用朝鲜汉字读音、但因其由上到下的直读方法而能够更接近于“汉文式直读”，故而会自认为是所谓“更为正统的”汉文读解方法。朝鲜半岛也正如其历史所示，是以中国朝贡国身份而得以历代执奉中国正朔、并一直在努力成为“汉字文化圈”的“优等生”的。而至于朝鲜半岛上“汉文训读”又缘何消逝的问题，也便能够在上述历史大文脉中得以解释了。由此可见，就汉文训读而言，日本与朝鲜半岛所选择的不同发展路经真可谓大相径庭。

中国的古典文化，是能够被视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文明的。所谓“普世性文明”，是指在多样且异质的地域中，能够实现在接受中变容、又能在变容中普及、并极富灵活性的一种文明。那种执拗于固守自己的原型而欠缺灵活性的文明，充其量不过只是一种“民族文化”而已。但历史上曾被视为汉字文化圈中“劣等生”的日本，却反而能够将中国古典文化彻底再解释并进而彻底消化成为日本自己的文化；就其结果而言，日本对于中国古典文化接受与变容的过程，同时也就显示并证明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确是一种“普世性文明”，而日本的“汉字文化”也就成为中国古典文化走向“普世性文明”的一个绝佳范例。

综上所述，我本人正是这样来思考日本的中国文化受容特征的；同时对于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研究而言，日本以勇于成就“自我”的积极主动性、也使其实现研究应该能够具备日本自己独到的特征。而我也满心欢喜地由衷期待着，日本

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成果是一定能够通过本套《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续编,来进一步介绍给中国研究者和读书人认识的。

2022年11月28号于日本东京

(松原朗,日本杜甫学会副会长,日本中国学会理事,日本闻一多学会理事,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特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修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附日语原文:

「八人集続篇の企画に寄せて」

松原 朗

現在、「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続篇」(仮題)の収録内容が決まり、精力的に翻訳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る。順調にいけば、2024年の夏には全冊の刊行が実現していることだろう。

吉川幸次郎(仮題「杜甫と中国古典文学の精神」
松原新規編集)

宮崎市定(仮題「唐宋変革史論」礪波氏新規編集)

礪波護(仮題「隋唐政治社会史論考」著者新規編集)

古賀登(「兩税法成立史の研究」雄山閣)

池田温(「唐史論攷」汲古書院)

松浦友久(「陶淵明・白居易」研文出版)

黒川洋一(「杜甫の研究」創文社)

川合康三(仮題「唐代文学叢考」著者新規編集)

この「八人集続篇」は、先に西北大学出版社より刊行された「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2019年、主編李浩?松原朗)の後を承ける形で企画された。この「初編」の内容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り、唐代に関する史学4冊、文学4冊で構成されている。

妹尾達彦《隋唐長安與東亞比較都城史》

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

丸橋充拓《唐代軍事財政與禮制》

石見清裕《唐代外交與墓誌》

古川末喜《杜甫農業詩研究——八世紀中國農事與生活之歌》

埋田重夫《白居易研究——閑適的詩想》

松原 朗《晚唐詩之搖籃——張籍・姚合・賈島論》

岡田充博《唐代小説〈板橋三娘子〉考》

八人集の企画立案の経緯については、李浩教授の「総序一」ならびに私の「総序二」に詳しく述べられているが、要点は二つであり、日本語で書かれているが故に中国の学人や一般読書者の目に触れることのない優良な研究成果を伝えるためであり、第二に、中国から見れば一衣帶水の東にある日本には中国の古典文化を敬愛する伝統があつて、それが現在にも引き継がれていることを、観念論としてではなく、具体物を以て伝えたいと考えたためである。

これは私が日本人だから言うことではなく、客観的な事実なのであるが、日本は韓半島、ベトナムに日本を加えたいわゆる「漢字文化圏」の劣等生である。劣等生とは、教師の期待通りには学ばない学生という意味である。

象徴的には、第1回遣隋使(600)以後、一貫して中国の正式な朝貢国となることを忌避する曖昧外交を採ったという事実がある。中国王朝の正朔を奉ずることなく、今日に至るまで独自の元号を保持しているのは、その分かりやすい結果である。

科挙も興味深い論点である。韓半島とベトナムでは、近代に至るまで儒教經典に依拠した挙を行ってきた。しかし日本では、国を挙げて律令制度の導入に邁進していた平安時代(794~1192)の初期に科挙の縮小版である「式部省試」が行われたことがあるが、まもなく廃止されている。直接的な理由は、当時まだ古代的な氏族制が根強かつた日本では、個人の才知を評価するという科挙制度は時期尚早だった

たためである。しかしその後の文明の発展の中でも、日本ではついに科挙を導入する機運は生まれなかつた。日本では鎌倉時代(1192~1333)以降に血族の紐帯に基づく在地的豪族「武士」の時代に移行して、1868年の明治維新まで武士の支配は継続する。江戸時代(1603~1867)の武士は実質的に政務を担当する文官として、次第に教養官僚層へと変化してゆくが、しかし藩(諸侯国)に所属して在地性を失うことはなかつた。武士の支配とは要するに、科挙制度が個人の才知を重視して中央に精英を集めようと考えたと背反する事態である。日本が科挙を実施しなかつたことは、こうした日本における「政治権力の分散性」という歴史の大文脈で理解する必要がある。

科挙がないとは、中央が文教政策を掌握しなかつた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江戸の幕府(中央政府)は朱子学を文教政策の基本に据えたが、しかし18世紀を待たずに反朱子学を標榜する伊藤仁斎(1627~1705)や荻生徂徠(1668~1728)が登場して百家争鳴の事態となり、その間隙を突くように、漢学(儒学~漢詩文)そのものを否定する本居宣長(1730~1801)らの国学や、前野良沢(1723~1803)らの蘭学(西学)が勃興する。幕府は異学の禁(1790)を出して朱子学への回帰を催したが、効果は薄かつた。日本の漢学に独自性があるとすれば、個々の学説や文風の特徴を論ずる以前に、それらが育つた日本に特有の「放任」の文化風土に注目す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

科挙以外に注目するならば、日本に独特的な「訓讀」も重要である。最近、金文京氏(在日韓国

人)の『漢文と東亜世界』が日本語から漢訳されて、中国でも話題になつてゐるといふ。金氏曰く、訓読とは、中国語の語順を自国語の語順に変えて読解する方法であり(例えば中国語 V+Oは、日本語 O+Vの語順に転倒)、この現象は日本に限らず、韓半島、蒙古などの周辺地域でも広範に行われた。但しこの指摘には大事な点が漏れている。恐らく日本だけが、訓読を読解の姑息な便法の枠を超えて、「日本語の正規の文体」へと成熟させたことであ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は、「朋有り遠方自り來たる、亦た樂しからずや」のように、なるべく元の漢字を残し、一部の助字だけを、例えば「不」「乎」は平仮名の「ず」「や」に変換する。このように訓読された文は、もはや「正格な日本語」である。昭和天皇の1945年8月15日に発した終戦詔勅の冒頭「朕、深く世界の大勢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非常の措置をもって時局を收拾せんと欲し、ここに忠良なるなんじ臣民に告ぐ」は、いさきか古風ではあるが高雅な日本語である。それでいながら、「朕深鑑世界大勢与帝国現状、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時局、爰告汝忠良臣民」と中国語に直接変換できる関係にある。こうして形成された訓読文体は、和文体(源氏物語の文体)と両極を成し、両者を折衷した和漢混淆文体(平家物語の文体)を加えて、日本語の伝統的書写文体の鼎足となつた。現代日本語の文体は、この和漢混淆文体の発展型である。要するに単純化すれば、漢字と漢文を、訓読という方法を用いて日本語の中に徹底的に溶解し消化した。他方、韓半島では李氏朝鮮(1392~1897)の時代、それまで萌芽的に存在していた訓読を廃止

して、朝鮮漢字音による直読法に切り替えた。このため訓読を自国語の正格な書写文体に成熟させることはなかつた。朝鮮がこの方法を選んだのは、上下転倒して読む訓読よりも、朝鮮漢字音を用いるとは言え上から下へと直読する方法が「中国語による直読」に近い、つまり「より正統的」な読解方法と考えたためだらう。韓半島は、中国の朝貢国となって歴代中国王朝の正朔を奉じたことが示すように、「漢字文化圏」の優等生になろうと努力した。韓半島における訓読の消滅は、こうした歴史の大文脈の中で解釈できる。日本と韓半島の進んだ道の間には、大いに径庭があつたと言つべきだらう。

中国の古典文化は、普遍文化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普遍文化とは、多様で異質な地域において、変容を受け入れながら普及する、柔軟性に富んだ文化である。原形に固執して柔軟性を欠く文明は、たかだか「民族文化」に過ぎない。「漢字文化圏」の劣等生である日本において、中国の古典文化は、徹底的に再解釈されて、日本文化として消化された。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古典文化の受容の過程は、結果として、中国の古典文化が普遍文化であることを示す好個の事例となっている。

私は、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文化の受容の特徴を以上のように考えている。その日本における中国古典文化研究には、おのずからにして独自の特徴が備わっているはずである。その優良な成果を、このたび「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続篇」として中国の研究者と読書子に紹介できることを、心より嬉しく思つてゐる。

(松原朗 2022年11月28日)

山川异域，心理攸同

李 浩

近几十年来,海外汉文文献的整理与海外唐研究成果的译介还是很可观的。仅以日本见在的汉籍调查及介绍的成果而言,如金程宇《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凤凰出版社 2012 年),囊括了大量稀见和刻本唐代文学文献,金程宇为书中每部汉籍撰写的提要(解题收入金程宇《东亚汉文学论考》,凤凰出版社 2013 年)。沈津、卞东波编著《日本汉籍图录》,也收录了大量日藏汉籍,并有影印图片配以解题说明。目录学研究方面,稍早的有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较新的成果如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以我比较熟悉的师友而言,大陆学人张伯伟、郑杰文、尚永亮、蒋寅、程章灿、杜晓勤、查屏球、查清华、金程宇、卞东波等都有持续的新成果问世。

四百年前,明末“西学”翻译运动先驱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科学与学术的“超胜”其实包含对学术新知和科学新突破的及时了解和共享,以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学术共同体能在共享知识的同时,能以开源系统和平台的模式,修正和升级已有的知识版本。幸运的是,20 世纪前半叶“五四”运动前后、20 世纪后半叶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出现了两次翻译的高峰,与现代学术文化的两次狂飙突进恰好同步。

由我与松原朗教授合作主编的这套《日本学者唐代文化研究译丛》也是对这样的学术新潮的一种“预流”,该项目提出后能被遴选入“十四五”时期国

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说明出版界同仁也具有敏锐的学术眼光。通过文化互鉴以深化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通过成果刊布以促进国内学术研究再上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高校的人文学科发展很快,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突飞猛进,很多学校的硕博士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每年在审读各校的硕博士论文时,我也发现很多学校的硕博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不懂得如何参考相关领域的海外研究成果,这一方面是因为缺少学术伦理训练。另外一方面,也是海外研究成果获得不易,所以我相信本书系的持续推出,一定会泽慧学林,特别是会引起学界年轻朋友关注追踪国外同行学术新动态的兴趣,从而整体上提升学术研究水平。计算机的“芯片”研究我们要追踪世界科技新动态,做出自己的原创性成果。同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我们也要与国际同行旧学商量,新知涵养。因为历史的原因,包括唐代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光是我们的“国粹”,也是东亚地区的共同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携手努力,推动这些文化遗产“走出去”。

当然,我们的工作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和复制。我所谓的“重复和复制”是指翻译内容的重复和编译理念的复制。前者比较好理解,就是说,收入本书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初译和初编。后者则是松原朗先生提出的一个理念,他希望能够将最有日本汉学特点,或者说是具有日本学派的著作介绍给中国

的同行。我们此前主编的《日本学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恪守此理念,本套书系仍坚守此理念。唯前一套书侧重一线学者,本套书系则侧重已经有定评的资深学者的成果。当然,也有朋友提出,可以把日本学界最新锐的、最新潮的有潜力的中生代甚至年青学者的成果集中译介一批,证明日本年青一代学人承前启后,在唐代文化研究方面薪火相传。这个工作可以做,但只能放在下一步了。

本书系选择与久负盛名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合作,主要是感念与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学术友谊,感激集团几代出版人为唐代文学研究的贡献。这次与出版社合作,拟隆重推出我与日本学者松原朗先生合作主编的这套大书,近因是我看到了出版社管理与编辑团队的敬畏学术、精益求精的奉献精神。远因则要追溯到几十年前,我自己还是学生和青年教师时,陕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安旗先生的《李白纵横探》,高海夫先生的《柳宗元散论》,阎琦先生的《韩诗论稿》,郁贤皓先生的《李白丛考》,罗宗强先生的《唐诗小史》,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当然还有唐代文学学会的会刊《唐代文学论丛》《唐代文学年鉴》,其中刘善继先生、郭文镐先生、惠西平先生、宋亚萍女士在这几十年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日月穿梭,斗转星移,我作为唐代文学研究的后来者,铭记着过往的这些成果,也愿意与更年轻的一代出版人携手并进,开创国际唐代文学研究的新时代。

学术翻译实际上是一桩“铺路搭桥”的功德活,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我自己的知识缺陷,我的日语、英语都无法胜任学术翻译,之所以还敢觑颜人前,忝列主编,实际上是因为具体工作的需要。各位译家给两国的学术界“铺路搭桥”,而我则是为两边的出版界、学术界和翻译界的交流铺路搭桥。为

了保证翻译质量,我们敦聘相关专家审读译稿,提升质量。本书初版后,还希望翻译界、唐史界、唐代文学研究界的同行,继续批评,我们也愿意虚心接受,反复打磨,将本书系打造成精品图书。

本文题目第一句“山川异域”典出《唐大和尚东征传》,第二句“心理攸同”出自钱钟书《谈艺录》序言。鉴真和尚在决定前往日本传戒律时,与众弟子谈话中的内容,原文如下:

时大和尚在扬州大明寺为众僧讲律,荣叡、普照至大明寺,顶礼大和尚足下,具述本意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日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大和尚东游兴化。”大和尚答曰:“昔闻南岳慧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

这句沉潜在历史典籍中的词语,因为2020年的大疫情再次被激活,让人们又联想起一千多年前两国前贤的交流交往。清末民初诗人巨赞有赠日本僧人的一首诗:“风月同天法运长,圆融真谷境生光。天台立本情无隔,一树花开两地芳。”原诗也是讲佛教文化交流的。“一树花开两地芳”的寓意更形象也更恰切,我希望我们书系中的译稿能像原著一样,甚至比原著吸引更多的读者和中文学术界的同行。

(李浩,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西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是学科评估、学位点评估的重要支撑。从国家新文科建设、重大科研项目立项、标志性成果产出看，中国古典文献学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增长潜力。为充分发挥西北大学在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综合优势，统筹整合校内资源，有效推动古典文献学研究，产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持续扩大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在海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2015年6月1日，西北大学印发了《关于成立古典文献研究所的通知》(西大社科[2015]1号)，标志着古典文献研究所正式成立，属性为西北大学无行政级别虚体机构。

自挂牌成立以来，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等工作，持续推进学科方向凝练，形成传世文献、域外汉籍、地方文献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在杜甫研究、韩愈研究、李梦阳研究、唐代诗文研究、陕西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形成一定的优势和特色。目前，古典文献研究所共有7名成员，由陕西省“特支计划”领军人才、西北大学二级教授郝润华担任所长，成员有贾三强教授、赵阳阳副教授、杜学林博士、周喜存博士、郭琳博士、周日蓉博士，除贾三强教授为退休返聘、周日蓉为在站博士后外，其他成员均为学校在岗在职人员，是一支踔厉奋发、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团队。

西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重视挖掘古籍的



时代价值，注重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申报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类项目，加强珍贵古籍资源的保护传承和转化利用。古典文献研究所成立以来，累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21项，立项金额达到2182.96万元。其中：郝润华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汉籍调查编目、珍本复制与整理研究”（立项号：20&ZD276），在西北大学域外汉籍整理研究方面发挥了筚路蓝缕、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贾三强教授主持陕西省“十二五”“十三五”古籍整理重大项目——《陕西古代文献集成》（初编、二编）总立项金额2000万元，是西北大学有史以来人文社科类立项金额最大的科研项目，文学院赵小刚教授、杨遇青教授、沈文君副教授、邵颖涛副教授、赵阳阳副教授等皆为课题组重要成员。赵阳阳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唐文纪事》校证与研究”（立项号：16CZW020），结项等级为“优秀”。杜学林博士

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刊《详注昌黎先生文》整理与研究”(立项号:19CZW021)、郭琳博士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古代编年体佛教通史的撰述与价值”(立项号:20XZJ002),进展顺利。杜学林博士主持的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校证”(立项号:164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万历野获编》编纂与版本研究”(立项号:2020M683531),周喜存博士主持的全国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南村辍耕录》校笺”(立项号:2053),也在积极推进。此外,古典文献研究所成员还主持了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一般项目 2 项,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1 项,陕西省教育厅项目 3 项等。

近年来,西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成果丰硕,已累计发表科研论文 48 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 1 篇,核心期刊论文 16 篇,普通期刊论文 31 篇。郝润华教授在《文献》发表《明朱安湄〈李空同先生年表〉辨误》一文,对《李空同先生年表》中存在的错讹与疏漏之处做出考证纠谬,进一步

厘清了李梦阳生平史事。贾三强教授在《西北大学学报》发表《牛兆濂〈蓝川四集〉考论》一文,根据新见《蓝川四集》钞本,对关中大儒牛兆濂的理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进行阐发。赵阳阳副教授在《图书馆研究》发表《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考论》一文,对郁逢庆生平、《书画题跋记》成书过程与抄传印行等进行考证,并揭示了该书的价值、阙失与影响等。杜学林博士在《古典文献研究》发表《〈顾曲杂言〉与〈万历野获编〉关系新考》一文,认为《顾曲杂言》系后人在搜辑重编《万历野获编》时将原本独立成书的单行著作误辑窜乱而入,对学界习见错误认识进行了辨正。郝润华教授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发表《李梦阳的杜甫情结》一文,认为李梦阳不遗余力摹习杜诗,提倡学习杜诗的格律法式,具有强烈的杜甫情结,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古典文献研究所已累计出版专著 18 种,其中郝润华教授《李梦阳集校笺》列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是一部具有填补空白和学术示范意义的古籍整理著作。郝润华教授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亦列入中



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贾三强教授主编的《陕西古代文献集成》已出版 40 辑,郝润华教授主编《武威历代诗词丛书》已出版 4 种。赵阳阳副教授《明代书学文献研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明代书学文献中的传记类、著录类、题跋类、论述类、金石类文献进行研究,刻画出明代书学文献的基本面貌,发现并解决其中存在的文献问题。郝润华教授、周日蓉博士编著的《目录学讲义》在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目前学术界最新的一部目录学教材,也是一部高质量的目录学著作。

西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的成果得到了政府部门和学界同仁的高度认可和赞誉。郝润华教授《李梦阳集校笺》先后荣获 2020 年度读者喜爱的中华书局十佳图书(古籍学术类)、2021 年度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十五次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贾三强教授《康对山先生集》荣获陕西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郝润华教授《五百家注韩昌黎集》被评为 2019 年度读者喜爱的中华书局十佳图书(古籍学术类)。赵阳阳副教授参与的《基于经典细读与方法引导的古代文学创新人才培养系列教材建设与教学实践》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杜学林博士、周喜存博士参与

的《大学语文》课程荣获陕西省第四届本科高校课堂教学创新大赛二等奖。贾三强教授荣获西北大学 2018 年度科研奖,郝润华教授荣获西北大学 2021 年度科研奖。郝润华教授入选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领域“特支计划”领军人才。郝润华教授荣获西北大学文学院“南山学者”奖,古典文献学研究团队荣获西北大学文学院“锦熙”优秀学术研究团队一等奖等。

学术进步离不开学术交流,西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积极主办、承办、参与高层次学术会议,先后主办“《陕西古代文献集成》首批新书发布会暨二期项目启动会议”(2018 年 3 月)、承办“第三届古文献学青年学者沙龙”(2019 年 3 月),“典籍整理与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暨《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第二批)新书发布会”(2019 年 12 月)等高端学术会议,与日本长崎大学合办“东亚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21 年 1 月)等学术会议,“‘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汉籍调查编目、珍本复制与整理研究’开题论证会暨‘域外汉籍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2021 年 4 月),“日藏汉籍与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22 年 11 月)。参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大型地方历史文献编纂与出版学术研讨会、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年会、明代文学青年学者论坛等。郝润华教授受邀参加中央文史馆第八届国学论坛并发言。古典文献研究所还邀请原《文献》杂志副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张廷银教授做了《地方志资料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报告等。社会兼职方面,郝润华教授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韩愈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特聘研究员等。贾三强教授





为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赵阳阳副教授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

西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培养点,培养高质量专业人才是工作的重中之重。2015年以来,已累计培养博士研究生 14 人、硕士研究生 30 人。现有博士后研究人员 1 人、在读博士 9 人、在读硕士 18 人。每年定期举办“芸台读书会·古典文献工作坊”“草堂读书会”“新生见面会”等活动,注重提升博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杜学林博士学位论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研究——以版本问题为中心》被评为 2017 年度陕西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19 级硕士研究生杨萌荣获 2020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奖学金、“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等荣誉。李旭辉、戴启飞、兰博等硕士研究生荣获国家奖学金。2020 级硕士研究生戴启飞荣获“第十五届汉文佛典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一等奖,2021 级硕士研究生文心怡荣获首届“樱花杯”西安高校诗词大赛暨全国大学生诗词创作大赛团体第一名等,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效。

西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注重抉发中国古典诗词



中蕴含的立德树人、培根铸魂以及启智润心的成分,发表《古典诗词箴言里的真善美》(《光明日报》2021 年 1 月 14 日)、《影响孩子一生的 70 首经典古诗词》序》(中华书局 2020 年版)、《用感性的眼睛发现真善美的世界》(《深圳特区报》2017 年 7 月 25 日)等多篇文章,出版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道德箴言》等著作,积极参与“陕图讲坛”等公益讲座,努力为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积极贡献。

西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主动适应新媒体发展趋势,推出“西大古典文献”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教师和研究生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截至目前,已推文 106 篇,累计浏览量超过 2 万人次。自成立以来,古典文献研究所管理运行规范,科研成果丰硕,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学科建设、学科评估、学位点评估等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域外汉籍成为本所新的研究热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新的增长点,拥有广阔的发展潜力。西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拟成立“域外汉籍研究中心”,积极引进国内外中青年学术骨干,逐步扩大“文献学研究团队”,在学界发出“西大文献”的声音。

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王伟



王伟，男，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陕西省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文秘专业主任委员、陕西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200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2014年至2015年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至美国西肯塔基大学宗教哲学系从事学术交流与访问。

教学方面，王伟教授先后为本科生讲授专业必修课程“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为硕研究生开设“唐宋文学专题研究”“隋唐五代专家专书导读”等课程。编著《中国文学经典导读》(独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出版)、《陕西师范大学

课程思政优秀案例》(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经典导读》(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史》(教育部“马工程”教材，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等十余种教材，并获全国首届优秀教材奖二等奖、陕西省优秀教材奖“特等奖”。在中国大学慕课网建设慕课两门。主持教育部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项目“‘优师计划’特色课程数字化建设与教学模式探究”、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教改项目“基于‘互联网+’背景下的新时代高师院校教育实习体系探索与构建”、陕西省教育科学改革研究项目“立德树人语境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与探索研究”、陕西省一流本科课程、陕西省特色课程等，并在《中国大学教学》《中国高等教育》发表《〈中国文学史〉与〈历代文学作品选〉的百年纠葛与现实出路》《若无新变、难以代雄——新文科视阈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拔尖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之探索》等教学类论文。所在教学团队先后获“全国第二批黄大年式教学团队”“全国课程思政优秀团队”。

王伟教授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十余项。主要有：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出土墓志与唐代家族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多维视阈下唐代碑志与文学研究”、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转型与唐代关中文学群体研究”、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2011年博士后面上项目“唐代关

中本土文学群体研究”、2022年教育部“春晖计划”海外交流项目“隋唐家族文学生命意识研究”等。出版学术专著《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唐代关中本土文学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在《文艺研究》《复旦学报》《中华文史论丛》《光明日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成果先后获教育部第八届人文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青年成果奖”、中国博士后管委会“优秀博士后科研成果奖”、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王伟教授的学术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层面

一、新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

王伟教授通过对碑志之文献、文本、文学、文化性质予以梳理,借助“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碑志文学与政治、社会力量的相互塑造,为文学经典的塑造提供新的阐释语境。首先,通过梳理碑志文本,订补传世文学文献记载之讹误与缺失。一方面藉新出墓志,围绕墓主世系、婚姻、交游网络进行群体式研究,对“玄武门之变”“杜甫寓蜀心态”“安禄山事迹”等事件或典籍的传统论述与文献予以订补和重新考释。另一方面,将墓志所载相关政治事件与传世文献记载对读,探求其间文本书写策略与家族心性。代表性论文有《〈韦匡伯墓志〉及其婚姻关系考论》《杜甫、何邕交往诗之时地新证与文学意义》《姚汝能及〈安禄山事迹〉新考》等。其次,分析碑志文本制作、传衍的内在机制,研究文本张力与经典塑造间的关系。碑志文本的呈现形态有石本、集本、拓本、录本等形式,各文本间既有互文性,又因受丧家、撰者、刻者、书者、拓者等不同力量的牵制,表现出碑志文本制作、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性。代表性论文有《书

家诗心:蔡襄〈洛阳诗帖〉本诗及其书学意义考论》《文本失控与经典重塑:〈瘗鹤铭〉作者“陶弘景说”再辨》等,通过对纸本与石本对勘,分析其经典化过程中的层累化特点。再次,推动碑志文献研究由“金石学”向“碑石学”转型。通过厘清现代学术体系下碑志文学与传统经学主导下的金石学的界限,对研究范畴、理论思想、价值追求、内容层次、方法路径等进行探索。主张碑志研究应由“萃取式”的片段研究转向“全面式”的内涵研究,积极推动“金石学”向“碑石学”的学术范式转型。代表性论文如《中古碑志研究的“新”与“旧”》。

出土碑志虽文学、文献价值亦无可替代,但尚未进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文学研究应“贴地而行”,才能将特定时代的文学理念与趣味具体勾勒出来。经王伟教授的上述研究,不仅使碑志研究突破传统金石学的牢笼,推动墓志文献研究思路转型,同时也推动文学观念的复原,通过对碑志研究之学术方法、视域、规范的多维探索,有力推动了“碑石学”学科方向走向成熟。

二、唐代关中本土文学群体研究

长安文化精神对中国文学发展具有巨大影响。王伟教授以长安为中心,辐射关中,通过对家族、地域等文人群体的文化观照,探寻长安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与意义。首先,以家族、地域为基点建构两个“长安”的文化话语语境及其文学意义。“历史长安”为汉唐帝京,而“地域长安”则与巴蜀、齐鲁、江左、河朔等文化圈并列,是关陇文化的精核。长久以来,“地域长安”多为“历史长安”之光圈所遮蔽,长安本土文学特性亦被时代文学的宏大叙事场域所淡化。通过研究长安本土文化群体,以“自下而上”视角为指引,为文

学演变、文化转型提供“地域长安”的在场性证明和个体化言说语境。围绕此主题,出版《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唐代关中本土文学群体研究》等专著,发表论文 11 篇。其次,以“地域长安”回应唐宋文化转型、文化中心转移等重大学术关切。结合地缘、血缘、业缘、姻缘、友缘等因素,对以京兆韦氏为代表的关中文学家族的婚姻网络、文学圈层、社会流动等内容进行研究,围绕汉—唐“士族化”与唐—宋“士庶化”的文化转型,发掘时代变局在家族群体内部的力量投射,通过中晚唐长安文人群体的地域横向流动,为文化重心转移提供细节说明。先后在《复旦学报》《求是学刊》等刊物发表《“正统在我”:中古正统建构与文学演进》《学缘与血缘互涉背景下两汉韦氏诗学精神嬗衍论析》等论文。再次,总结长安文学群体发展的内在文化因由,以资当下家风与公德重建。以京兆韦氏、杜氏、杨氏为代表的关中文化家族群体在长达八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谨守诗礼传世之家学和廉洁忠直之家风,不与世俯仰。对其精核予以总结,既启迪当下,又惠助公德建构。先后发表《中古家风家学与家族文学》《互涵同构:家训与家族文学的共生关系》等论文。

王伟教授在该层面的研究,不仅回应了唐宋文化转型、文化重心转移等重大学术关切,而且对于唐宋文风丕变、社会流动与文学变迁等问题研究亦有重要意义。从整个研究架构上看,他的研究主要以“士庶力量消长”和“地域文化整合”为线索,以文化转型与唐代关中文学之同构关系为基本架构,研究关中文学与唐代南北文风融合、古文运动、复古文学思潮之关系,历时性分析关中文学发展的群体特征和具体形态,研究关中

文化精神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同时,论析关中文学创作对唐宋文化转型的参与,揭示关中文学创作与中唐文化风尚变迁之关系,论述关中文学群体之俗体文学创作对中晚唐文坛雅俗风格递嬗的影响,对唐代文学中的文质、通变、雅俗和复古与疑古关系的文化背景与具体内容进行基层视角下的意义重诂。

三、唐代音乐文学研究

长安为隋唐音乐交流之重要空间场域,亦为音乐文学之渊薮。王伟教授对此着重从如下两方面开展研究。首先,重新审视燕乐形成与词体成立的关系。依据燕乐形成之阶段性与时代性,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考察词体形成的渐进性与变异性,成果有《唐代音乐交流之阶段性看词体的形成与发展》《唐五代诗体背景下词体的形成与发展》等。其次,以词体变创为背景,对经典作家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对冯煦“词心”理论予以增益,发掘秦观“词心”内涵之流动性。成果有《“词心”建构:秦观身世与词风之互文及其词史意义》等。

王伟教授通过对唐代音乐文化交流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交流路向和内容之探究,为词体结构、风格特色、描写对象、艺术境界和价值意义等内容与形式的建构提供丰富的音乐文化语境。这既有助于重新省思燕乐形成与词体成立的关系,又借助于诗词互文的关系,有助于学术界对中晚唐词体之成熟予以重新探讨。

学术研究惟勤勉力行,方能精进。王伟教授别具学术活力,期待他能不断为学界贡献更多精彩的研究成果,为推动学术进步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奋斗。

杜甫研究专家——胡永杰



胡永杰，男，1974年9月出生，河南舞阳人。文学博士，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兼任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理事。早年中师毕业，曾在中学任教，后考入郑州教育学院中文系、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2002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王新霞、朱宝清教授的指导下获得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2005年至2022年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曾赴西北大学李浩教授门下攻读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22年12月调入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胡永杰的学术研究生涯，始于2005年硕士毕业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2006年适值著名李白研究专家、杜甫研究专家葛景春

先生返聘回河南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得以朝夕相处、时常请益，建立师生之谊。2006年，葛景春先生主持“杜甫与中原文化”课题，胡永杰受命参加其工作，于2007年完成出版。2010年，葛景春先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杜甫研究》，再次命他参加，承担其中杜甫与蜀中文化、巴渝文化相互关系部分的研究工作，他协助葛先生于2014年完成课题研究，2016年以《杜甫与地域文化》之名出版。在葛景春先生的指导下，通过参加这两个课题研究，他确立了以杜甫研究为主的学术研究方向，并兼及李白研究等领域，发表有《20世纪以来李杜比较研究述评》、《从数量统计看20世纪李白诗歌经典地位的变化及特征》、《开元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李白两人洛阳求仕考》、《唐代洛阳“三关道”上的三种诗境》、《别业、两京道与岑参早年的诗歌之路》、《论房琯对中唐初期士风与文风的影响》等论文。

2014年，经葛景春先生推荐，胡永杰负笈西安，到西北大学李浩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受李浩教授影响，开始对唐代士族迁移（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称之为“唐代士族中央化”）、唐代文学与文人园林别业生活之关系等问题产生浓厚兴趣。他把这些现象和之前关注的杜甫研究、文学与地域关系研究相结合，遂致力于“唐代洛阳文学空间”、“杜甫与洛阳之关系”等问题研究。2018年，他以《空间视阈下初盛唐河洛文学研究》为题，完成博士论文；随即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洛阳文学空间研究》工作，发表《从士族中央化

到中隐风尚——试论唐代两京文人生活的变革及其原因》《宋之问：别业与吏隐生活》等论文；从空间构成、空间特征、空间发展演变、文人构成及变迁等角度对唐代洛阳文学与文人生活环境之关系做了考察探索。同时，也在士族迁移、文人与园林别业关系等视域下，对杜甫早年以洛阳一带为主的生活经历做出了一些新的考论，先后发表《晋唐时期杜甫家族的播迁过程及背景考论》、《杜甫“早充观国宾”当为开元十八、十九年前后由太学获监举参加科考事考辨》、《杜甫在洛阳居地的转移与心态的转变》、《论杜预、杜审言影响杜甫的唐代现实背景》、《仕与隐：杜甫天宝前后的两次移居》《杜甫“快意八九年”新解——兼谈杜甫壮游期的起点和终点》等论文。

以唐代文学文献为主的文献整理研究，也是胡永杰一直致力的一个方向。2009年前后，他整理河南省档案馆所藏主要石刻拓片，成《石刻拓片掠影》一书出版（河南档案丛书之一，人民出版社2010年）。2012年，中华书局约请葛景春先生点校明代高棅选编的《唐诗品汇》，他受命协助此工作，于2015年完成出版。2015年前后，他协助硕士导师首都师范大学王新霞教授完成《壮心未与年俱老：陆游诗词》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承担其中注释、集评工作。2017年前后，他参加博士导师李浩教授主编的《昆池长歌》一书的编撰工作（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和编撰组同仁一道对历代长安昆明池资料进行了

搜集整理。目前，他正在参加陈尚君、李浩、郝润华教授主持的《清编全唐文校订》工作（《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任分卷主编；参加李浩教授主持的《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整理工作，担任副主编之一，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彭燕研究员共同承担刘跃进研究员主持的《杜诗宋元注本丛书》之一《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的点校工作，即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看，胡永杰是一位文学背景研究、理论思考、考证研究、文献整理并重的优秀中青年学者，他的研究成果已经得到学界及社会的较大认可。如《杜甫与中原文化》一著获得2007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唐诗品汇》（点校）一书获得2015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杜甫与地域文化》一著获得2016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壮心未与年俱老：陆游诗词》一书，因受读者喜爱，出版社拟修订再版；论文《20世纪以来李杜比较研究述评》被选入中国李白研究会编选的《中国李白研究》集萃》，《杜甫在洛阳居地的转移与心态的转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7期全文转载，《论杜预、杜审言影响杜甫的唐代现实背景》《从士族中央化到中隐风尚——试论唐代两京文人生活的变革及其原因》等被刊物选出在公众号推送等。

新书推介

◆《唐代教育与文学》

本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研究唐代教育与文学关系的学术著作。作者全面考察了唐代教育与唐代文人成长创作及文学发展繁荣之间的联系,全书分上下两编共八章,52万字。上编从唐代教育制度、教育内容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群体扩大、唐代经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唐代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唐代重要文学现象的教育背景。教育资源的普及、教育受众的增加、诗赋教育的下行,无不与文学的盛唐气象息息相关。唐代有些重要文

学现象的产生也与教育有关,本书主要选取初唐四杰文学理想的建构、景龙文学盛况的出现、盛唐帝王式诗人的出现、中唐古文运动几个现象,分析其教育背景。下编考察了唐代童蒙教育、女性教育、留学生教育、书院教育与文学文化的关系。对《蒙求》《太公家教》《兔园策府》等蒙书、童蒙教育内容与儿童诗歌创作的关系、《女孝经》《女论语》等女教书、女性教育内容与女性诗歌创作的特点、留学生教育与留学生的文学活动、书院教育与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等问题亦提出独到见解。



◆《文心见园：唐宋园林散文研究》

商洛学院副教授李小奇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期资助项目《唐宋园林散文研究》(批准号：19FZWB045)于2021年10月结项，最终成果专著《文心见园：唐宋园林散文研究》，共40万字，于2022年6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学科交叉研究的广阔视域下，以唐宋时期的园林散文为研究对象，探究园林构建与散文创作之间的交互影响，揭示唐宋时期文学、文人与园林审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密切关系。该书分七章论述。第一章从传世文献中考查记园文本，分析园林散文文体形式的演变以及所蕴含的园林文献学价值。第二章溯源园记在唐代的创体和在宋代的立体过程，厘清园林游记和山水游记的本质区别，呈现唐宋时期园林散文的文学地位。第三章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唐宋时期园林大量兴造的社会风尚与园林散文书写之间的交互关系。第四章从文本细读中探析园林构筑与文人境遇的关系，总结唐宋时期的造园布景的审美原则，体现唐宋时期的美学思想，揭示园林营造与作文刻石的联系。第五章具体呈现园林宴游、节日游园、园林种植等活动在园林散文中的审美呈现，对比研究文学空间与绘画空间不同园林生活的艺

术表现。第六章考查园林散文在景观题名、景观描述、园林活动方面书写的发展演变。第七章分别从隐逸观念、政治、经济、生命意识、园林迁变几个方面解读园林散文的文化内涵。

这项研究成果在文学、园林学、社会学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可填补唐宋园林文学研究中散文专题研究的空白，拓殖园林文学研究的空间；可为园林学研究提供第一手文献，丰富深化唐宋时期的园林艺术研究；可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园林建设实践中，为当下园林生态化城市和乡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成功的参考个案，还可以应用到园林遗址的保护和复建方面。

